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2003/13 \*  
24 February 2003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3

### 会议工作安排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关于哥伦比亚境内人权情况的报告 \*\* \*\*\*

---

\* 因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 报告本身载于内容提要的附件中，仅以提交语文和英文分发。

\*\*\* 根据大会第 53/208 号决议 B 节第 8 段的规定，本文件提交得较晚，以便尽可能包含最新的资料。

##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内容提要.....		4
一、导 言.....	1 - 4	9
二、国家背景.....	5 - 24	9
三、国内武装冲突.....	25 - 40	12
(a) 游击队伍.....	30 - 31	13
(b) 准军事团体.....	32 - 34	14
(c) 保安部队.....	35 - 38	15
(d) 和平谈判过程的重要性.....	39 - 40	16
四、人权情况.....	41 - 54	16
五、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方面的情况.....	55 - 58	19
六、引起特别关注的领域或重要的领域.....	59 - 115	20
1. 法治与安全政策.....	59 - 77	20
(a) 内乱状态.....	63 - 66	21
(b) 恢复和巩固区.....	67 - 69	22
(c) 原非军事区的局势.....	70 - 73	22
(d) 准军事体制.....	74 - 77	23
2. 司法裁判和有罪不罚.....	78 - 87	24
(a) 监狱条件.....	84 - 87	26
3. 被迫流离失所.....	88 - 94	26
4. 族裔群体.....	95 - 101	27
5. 人权维护者.....	102 - 108	29
6. 基本自由.....	109 - 115	31
(a) 结社自由.....	109 - 110	31
(b) 见解和言论自由.....	111 - 112	31
(c) 良心和宗教自由.....	113	32
(d) 政治权利.....	114 - 115	32
七、对国际建议采取的后续行动.....	116 - 130	33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八、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哥伦比亚开展的活 动.....	131 - 151	36
1. 咨询和技术援助活动.....	135 - 151	37
(a) 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培训合作.....	137 - 144	37
(b) 体制建设合作.....	145 - 151	39
九、建 议.....	152 - 181	40
(a) 预防和保护 .....	155 - 162	40
(b) 国内武装冲突 .....	163 - 168	41
(c) 法治和不受惩罚.....	169 - 175	42
(d) 经济与社会政策.....	176	43
(e) 弘扬人权文化 .....	177 - 179	43
(f) 人权高专办的咨询意见和技术援助.....	180 - 181	43
十、哥伦比亚地图。领土与行政分区。重建与巩固区。 原非军事区.....		44
附件：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Main breaches and violations .....		48

## 内 容 提 要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哥伦比亚人权情况的报告所述及的期间为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这份报告是响应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要求编写的。

### 国家情况

本报告分析了哥伦比亚的国家情况，审查了 2002 年期间该国为维护法治、尊重人权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等项原则在一些政治、军事、经济、体制和社会性因素方面遇到的许多问题、困难和挑战。这些因素包括：帕斯特拉纳总统的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同民族解放军之间和平进程中断、主要由游击队和准军事团体犯下的暴力行为加剧了武装冲突、民怨久积、国家官员与准军事组织的联系时有所闻、非法团体对候选人和选民施加的压力妨碍了政治权利的正当行使。三月间的国会选举和五月间的总统选举是观测 2002 年政治景象的两项重要基准，可以从中看出安德烈斯总统政府的最后几个月和阿尔瓦罗·乌里韦总统政府的头一百天内的人权情况。

所分析的其他因素包括：于 8 月 7 日上任的新政府所通过和发展的治安政策、宣告处于内乱状态以后制定的措施、为 2003 年宪政公民投票所作的准备工作、为开始同准军事团体进行对话所采取的行动、国家在债务问题方面遇到的困难、财政亏斥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逐步进展的情况。

2002 年即将结束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的挑战。例如：武装冲突持续加剧，设法按照适当安排进行和平谈判以便政治手段逐步解决冲突的一切努力都遇到了困难。在这方面，显然，无论是从重新开始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的和解进程或持续进行政府和民族解放军之间的对话而言，都应该考虑由联合国秘书长通过他的特别顾问进行斡旋。

另一项挑战涉及政府和准军事团体之间的接触、对话和可能进行的谈判。应该澄清一下：哥伦比亚团结自卫组织领袖所提出的条件中究竟有哪些由于不致危害法治，而且不致偏离对真理、正义和赔偿的根本权利，因而可予接受。

政府和国家的一些经济部门所遇到的另一项挑战是由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需要引起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要求，以减少目前的不平等状况。

对对哥伦比亚政府、国会和民主部门来说都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增进和保护人权任务中寻求和达成更高水平的协议和相互支持。具体地说，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遇到的挑战是如何确保所有拟议的与维护公共秩序、司法和监督机构的业务活动有关的法规都能够符合国际社会所通过的文书，以保证以民主手段行使权力，并且有效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

### 国内武装冲突

本报告着重叙述了武装冲突对哥伦比亚人权状况造成严重影响，因而必须对人道主义危机作出有效反应的各项挑战。报告中也指出，武装冲突严重加剧，非法武装团体所使用的战斗方法也比以往残暴得多，平民的处境因而大为恶化。在这方面，本报告分析了游击队、准军事团体和治安部队的行为，着重指出务必根据适当的考虑因素和标准启动和平谈判的进程，这种安排应该具有取得成功的明确前景，而且能够对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问题作出早期阶段的承诺。

### 人权情况

本报告确认武装冲突加剧、贩运毒品以及经济危机等因素，历来导致人权状况恶化，国家保护和保障人权的能力也因而受到挫伤。非法武装团体的犯罪行为已经显示它们不尊重生命权、人格完整和人身自由。它们屡次攻击公共基础设施，使得国家在设法对严峻状况采取有效反应时遇到更大的挑战。报告中详尽地指出：新政府已经宣布它愿意遵守有关人权的国际和宪法义务。本报告着重指出，哥伦比亚主要在下列事项中取得了成就：批准各项国际文书、进行体制协调并采取统一的办法登记流离失所人口、宪政法院的判例能够尊重各项根本保证、以及副总统、监察官、总检察长和参议院等公共机构与人权高专办驻哥伦比亚办事处加强合作。

本报告载述了哥伦比亚在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情况严峻，从 2002 年的情况看来，该国存在着严重、大规模和有系统地侵犯上述权利的情事，有些侵权行为已构成危害人类罪行。法外处决(屠杀以及个别或有选择的杀害)、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过度使用武力的行动、强迫失踪、或非法或任意干预私生活和住宅、破坏正当程序和司法保证的情事均已纪录在案。本报告指出，应为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人是一些严重滥用权力、不行为或公开与准军事人员勾结的政府官员。

本报告阐述了关于保安部队成员直接涉及侵犯人权案件的举报与 2001 年同期相比大为增加的情况。这些行为有些涉及新政府的治安政策，主要是为了执行八月间颁布的、在内乱状态下制订的标准。这类行为有些是在有检察总署人员参加或得到他们核准的情况下实行的。

本报告在对哥伦比亚落实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情况所作的分析中评述了该国在经济及社会方面排斥现象严重、贫穷现象普遍、不平等状况根深蒂固等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教育不够普及、提供的保健服务和社会保险严重不足、国家补贴的住房大为减少。

本报告也查明了哥伦比亚在确认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方面所遇到的具体困难。尽管它在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如何促进男女平等、消除性歧视和边缘化以及持续存在的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等方面缺乏整体政策。

## 国际人道主义法

本报告指出，与 2001 年同期相比，战争罪行大为增加，平民受害的情事屡见不鲜。许多此类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行。在最值得注意的经常大规模发生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中，本报告提到了对应受保护的人员进行暗杀或施加死亡威胁、攻击平民、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行为、侮蔑人性尊严行为、劫人为质行为、强迫迁移行为、对医务人员和医务单位的攻击行为、攻击平民财产和使用杀伤人员地雷行为。该节也审议了遭受武装冲突之害的妇女和儿童的处境问题。本报告指出，大部分非法行为应该归咎于游击队员和准军事团体的成员。但是，它也指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控诉治安部队人员违反人道主义法的案件有所增加。

本报告着重指出，由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使用一些方法或战争手段，非法武装团体改变了战略，武装冲突也因而大为加剧。在这方面，报告着重指出了攻击平民的行为以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等非法武装团体日益使用恐怖主义行为的情况。

### 特别关心和重视的情况

本报告分析了高专办特别关心或重视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国内武装冲突、为维护法治制定和执行新的治安政策、与内乱状态有关的措施、治安部队在复原和巩固区采取的行动、已经解除武装地区的情况、增加和加强准军事团体、司法部门在打击不依法治罪方面所表现的缺陷和不连贯一致现象、监狱中普遍存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强迫迁移、族裔群体受害、维护人权人员和脆弱群体的另一些成员处境严峻、与基本自由的行使有关的一些现有问题(结社自由、见解和言论自由、良心和宗教自由、以及政治权利)。

本报告着重载述了这样的事实：哥伦比亚还没有就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采取有效和连贯的政策。这个缺点表现在其预防侵犯人权政策的弱点中，导致两个领域的状况每况愈下。流离失所的人数因而增加，维护人权人员更加孤立无援，他们受到公务员的恫吓、威胁、攻击和指责。

在特别关心的一些领域中，本报告着重指出导致法治弱化的一些因素和情况，表现在屡次出现的管理危机中，也表现在实行法治原则时经常出现的一些错误中。这种倾向表现在准军事团体的人员干涉政府职能，公务员和准军事团体人员长期勾结。优先制定的一些军事镇压政策也产生消极的影响，破坏了民事体制。本报告提到哥伦比亚通过和执行的一些条款不符合国际规范和该国宪法，其《2002年法令》中载有在例外情况下制定的这种条款。

在这方面令人关切的主要原因是军方插手司法警察的职务以及任意限制基本权利和自由。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一些机构以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作交易。例如，检察总署通过了由武装部队人员行使司法警察职务的决定，检察长也支持了为维护公共秩序而采取、但随后被宪法法庭宣布为违宪的一些措施。

## 国际建议的后续行动

本报告也扼要叙述了政府针对关于保护人权、武装冲突、法治和不依法治罪、批准国际文书、本国立法应遵守国际原则与规则、制定有利于行使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措施、倡导人权文化、以及技术咨询与合作等国际建议所采取的后续行动。本报告总结指出，许多事例显示，在履行各项国际建议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但着重指出了取得积极进展的一些事例：批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尽管有些政府在该法院对战争罪行的管辖权方面持保留意见)、通过立法把贩卖人口定为罪行、评估了内务部的保护计划、通过立法遵守《渥太华公约》、设立杀伤人员地雷观测所、制定必要措施扩大实行预警系统的领土范围、加强政府对此类系统的参与。

## 人权高专办驻哥伦比亚办事处的活动

报告中有一个部分继续叙述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2002 年在哥伦比亚开展的关于观察、法律咨询、促进和传播、以及由它负责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这些活动促进了检察总署、监察官办事处、高级司法委员会等若干政府机构的工作，这些机构欢迎高专办为改善它们与人权有关的工作所提供的咨询意见和合作。高专办也针对民间社会开展了这类活动。高专办驻哥伦比亚办事处也开始与新政府，尤其是副总统和外交部开展了顺畅和频繁的交流。该处新处长于十月间上任。

## 建 议

本报告最后载列了人权高专针对 2003 年各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事务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高度优先地位的具体建议，深信：这些建议的履行必定能够明显地改善哥伦比亚的人权情况。这些建议的范围涵盖了下列事项：预防侵犯人权和保护人权、国内武装冲突、法治和不依法治罪、经济和社会政策、倡导人权文化、高专办的咨询和技术合作活动。这些建议的贯彻执行，对于所有武装冲突地区和民间社会具有代表性的部门来说，应列为国家一级的优先工作事项。



## 一、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关切哥伦比亚境内的人权情况。这种关切已反映在委员会主席的再三声明中。1996 年委员会要求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据哥伦比亚政府的邀请在哥伦比亚设立一个办事处。

2. 根据哥伦比亚政府和当时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签署的一项决定，于 1996 年 11 月 26 日设立了人权高专办驻哥伦比亚办事处。根据该项协定的规定，该办事处应观察有关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情况，以便在目前暴力和国内武装冲突的背景下，为哥伦比亚当局制定和执行有关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政策、方案和措施提出咨询。高级专员因此而能向委员会提出分析性报告。在阿尔瓦罗·乌里韦总统的建议下，该项协定被延长到 2006 年 9 月。

3. 主席向第五十八届人权委员会发言时说，驻哥伦比亚办事处“在解决目前哥伦比亚境内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事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请高级专员提出“一份详细报告，其中载有人权高专办对哥伦比亚人权情况的分析。”

4. 这份报告涉及 2002 年 1 月至 12 月这段期间。它是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驻哥伦比亚办事处直接或通过其联络人收集的资料，随后由该办事处进行分析。对于它结论中的各项建议应予特别重视。

## 二、国家背景

5. 2002 年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因素使哥伦比亚的情势相当复杂和困难。该年年底，该国在维持其法治原则、尊重人权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等方面面对许多严重问题、困难和挑战。另一个值得强调的重要因素是 8 月 7 日新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就职时重组了政府。

6. 1998 年安德列斯·帕斯特拉纳总统的政府在他就职后不久向两个主要游击团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和民族解放军提出的和平倡议在 2002 年初突然中止，没有达到该国各部门所希望的积极结果。

7. 特别是在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进行谈判和结束谈判的方式上，显示公民社会不同部门对于哥伦比亚的现在和未来的想法和感受方面有较大的分歧。年初时，由于国际社会和教会的调解，两方正在克服整个谈判过程中的一个最大危

机并已制定了谈判与平民直接有关问题的时间表后，游击队伍的暴力明显增加了，导致政府中断该过程并恢复对所谓的“非军事区”的军事控制。另一方面，政府一方在这之前几个月没有采取明显步骤以纠正一个由于没有实在的结果而已失去社会支持和信用的过程。

8. 在帕斯特拉纳总统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谈判终于于 2 月 20 日中断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不久后就劫持了一架载有 Jorge Gechem Turbay 参议员的飞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行为越来越明显和普遍。4 月份绑架 Antioquia 州长和他的和平顾问及前任国防部长就是一个例子。帕斯特拉纳总统政府在与民族解放军对话方面也没有显著结果。这一游击队伍在这一年内不断地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9. 与此同时，政府企图扑灭所谓的准军事团体，特别是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团的暴力行为和减轻后者对政府某些部门和当地显要施加的影响，但没有效果。在 2002 年内继续收到关于准军事团体成员与政府官员有联系的申诉。

10. 具有各种复杂层面的贩毒活动继续是与武装冲突混合在一起的负面因素。生产和销售麻醉品是各个非法武装团体的主要收入，同时又在种植古柯的地区引起暴力和许多社区之间的社会冲突。它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许多宗强迫性流离失所，并且是行政事务方面发生贪污的主要因素。

11. 尽管各游击队伍和准军事团体引起的许多威胁和再三发生的暴力，该国还是举行了为 2002 年规划的两次选举，虽然选举都在一个紧张和两极化的气氛下进行。于 3 月 10 日举行了议会选举；5 月 26 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在这两个场合中各政党的显然弱点影响到整个民主制度的运作。

12. 在这两次选举期间，非法武装团体很明显地对人口中的许多部门施加了有违民主的压力。游击队伍和准军事团体通过暴力和恐怖活动，影响了许多哥伦比亚公民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在该国约 110 个城市中(总共有 1100 个城市)，不但投票者没有投票的完全自由，候选人也未能在充分平等和安全的情况下竞选。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总统候选人 Betancourt 遭到绑架。这两次选举各自有 43% 和 46% 的人投票。

13. 在三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时，Alvaro Uribe 的支持者获得了大多数的国会席位。在五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反对党自由派候选人阿尔瓦罗·乌里韦获胜，获得

53%的票数，以至不需要进行第二次投票。乌里韦先生在竞选期间，作为他竞选方案的一个要点，强调了他提出的“一个民主安全政策”。该政策主要是用国家军事力量镇压造反行动。然而，在他的就职声明中，国家新元首宣布他愿意在某些条件下与反叛团体对话和谈判。在同一声明中，乌里韦先生宣布其政府将通过公民投票发动一个重要的宪法改革程序。

14. “民主安全政策”的要点包括加强军队，增加军事和警察人员数目，在平民人口中设立一个线人和协助人网络和制定一个在农民间征兵的制度。

15. 8月7日，在就职典礼上，有人向波哥大市中心发射了迫击炮，导致21名平民死亡，100名受伤，并在据称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发动的攻击的邻近引起恐慌。四日后，新政府援引宪法第213条，签发了2002年第1837号法令，其中宣布整个国境处在内乱情况下。宪法法庭于10月2日作出的第C-802号裁决，决定该宣布符合宪法。

16. 根据9月11日签署的第2002号法令，政府为了恢复公安采取了严厉措施。该法令重新划定了康复和巩固地区，为规定它们的界限制定了程序，并为监测其运作制定了规则。该法令也使其能够限制这些地区的迁徙和居住自由，限制外国人的迁徙和居住自由，使用私人拥有的财产和强迫公民提供技术或专业服务。

17. 宪法法院在其11月25日的裁决中宣布第2002号法令中的若干规定不符合宪法，包括那些允许保安部队——包括军队在内——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进行逮捕、搜查和截取邮件和侦听的规定。

18. 政府向议会提出的一些立法提案，如税务、劳工和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也受到批评。在该年年底这些改革已成为法律(见本报告第七章)。

19. 政府拟议的公民投票在国会讨论了四个多月；它的形式是就一些十分不同的问题提出一系列问题。公民将于2003年就其进行投票。

20. 新政府逐渐意识到与该国巨大的债务和预算赤字有关的严重困难。它因此必须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以削减公共支出，这样就限制了它执行社会政策，改善人口的普遍福利和生活素质的能力。

21. 新政权采取了一些步骤，通过秘书长的斡旋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恢复了联系以讨论“人道主义交换”等问题。它与民族解放军维持的直接联系令许

多方面认为这种联系在不久之后能导致该反叛团体宣布停火。然而，在本报告定稿时，在国外进行的讨论似乎没有进展。

22. 该年年底，国会通过了 2002 年第 782 号法令，其中授权政府可与被宣布为非法的武装团体的发言人或代表进行对话和谈判并签署协定，而不必如法律以前规定那样先对它们予以政治承认。

23. 共和国总统要求天主教主教进行干预以便与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建立通信渠道。由于教会的斡旋结果，主要的准军事领导人宣布他们在 12 月初开始停火并表示在某些条件下愿意与政府进行讨论和谈判，以便签署一项和平协定。在 12 月底，政府设立了一个考察委员会，以研究与该团体进行和平过程的可能性。准军事成员这个新态度受到了政府发言人和民间社会的代表的欢迎，但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包括从法律观点来说，怎样处理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所犯的战争罪，和怎样处理近年来被该自卫队在其控制地区下强制没收的农村房地产。

24. 虽然该年年底的民意测验反映新政府获得民间的普遍支持，分析者指出这种赞成的态度可能由于某些事件、情况或趋势在未来某些阶段受到影响。举例说，如果经济上没有改善，如果贫穷人口扩大和失业人数增加等负指标继续下去或如果未能实现充分的具体行动，导致人口更安全和得到更多保护，制止了绑架和破坏。

### 三、国内武装冲突

25. 国内武装冲突由于其规模和战斗方式的恶化，毫无疑问对人口享有和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及一般的人权情况会发生重要影响。令政府感到越来越困扰的挑战是怎样有效地应付人道主义和人权方面的危机。哥伦比亚社会付出的军事费用反映了该冲突的原始影响，并转移了对其他基本人权问题的注意。如果能将用于冲突的资源用在其他目的上，可以在哥伦比亚的民事、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权利等许多关键方面带来重要的改革。

26. 由于战斗增加和争夺地区扩大到城市地区，<sup>1</sup> 因而越来越影响平民人口。武装冲突在 2002 年初显著恶化，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和平谈判发生危机，这种趋势变得更明显，在和平对话破裂和议定的非军事区被放弃后，事情变得更糟。

27. 与前一年比较，武装团体之间在 2002 年的冲突增加了，导致战士死亡人数增加，但难以确定数目，因为有许多宗伤亡没有被登记为杀人事件，又因为非法武装团体总把他们的死者带走。根据副总统办事处<sup>2</sup> 最受到战事影响的城市为太平洋地区的城市、Urabá(Antioquia 和 Chocó)、Arauca 和 Casanare, 以及东 Antioquia 城市 and 玻利瓦南部的城市。在这些省内的若干城市中和在 Medellín (Antioquia)和 Cùcuta(Santander 北部)城发生的战事导致死亡人数增加。

28.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五月份在 Bojayá (Chocó)市攻击平民或非法武装部队与 Medellín 附近的保安部队的冲突等事件付出了很多条人命的代价，也显示了政府要保护其平民人口和执行区别和相称原则有多困难。新政府改变了它在武装冲突方面的战略，它追求的安全政策目的在于加强国家军事能力和恢复对该国若干部门，特别是公路网的控制。这个新战略的一个重点涉及康复和巩固区。<sup>3</sup> 根据国防部，新政府将和平谈判结束后发动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非法武装集团中被俘虏的人数(特别是游击队伍人员)和伤亡人数增加了(各自增加了 44%和 52%)。

29.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民族解放军和准军事团体坚守阵地，将武装部队高度集中在周围地区，甚至企图控制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可直接出海或作为毒品和武器中转和贩卖的通路。此外，哥伦比亚武装部队在该国 Cauca 等省的行动得到民族解放军的支持，它们在反对准军事团体方面缔结了战略同盟。同时该冲突变得越来越城市化，这部分是由于游击队伍采取了将战事带入城市的战略，以增加对政府的压力和加强它们的谈判能力；部分是由于准军事团体将行动集中于城市地区的政策，以便控制农村地区的活动。在城市地区冲突的扩大也反映了一个战略，即通过中和、操纵或资助普通犯人帮系而达到目标。仅在 Medellín 的 Comuna 13, Antioquia 当局在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9 日之间就记录了 442 宗军人和平民的暴力死亡，比起 2001 年来增加了 100%。

(a) 游击队伍

30. 正如上文已指出，游击队伍加强了它们的攻击。遵循它们攻击政府各级机构的政策，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尤其是采取了新的战略，将乡下地区的部队撤回以避免过分暴露，让保安部队有机可乘。这些战略包括对诸如市长或市政府监察官等政府官员的威胁和攻击，使地方上的民主受到严重损害。在攻击平民人

口方面使用的方式，包括更多的劫持人质和恐怖主义行为，再加上加强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攻击，威胁到该国的政治和经济完整性并严重地限制了公共生活。任意地使用不适当的武器也使平民人口受害。对任何与政府有关的事物公开宣战的新战略使该国更难以治理并严重地影响了区域机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绑架目的似乎不单是作为其军费来源，而且也是为了反对政府的政策以显示该集团的存在；政府政策已受到恐怖主义行为的挑战。

31. 在民族解放军方面，由于军队和准军事集团不断攻击的后果，其攻击能力受到的影响可能多于其某些领导人采取的调解战略；后者选择了低姿态方法。然而它仍旧具有骚扰，特别是破坏经济基础设施和劫持人质的能力。

#### (b) 准军事团体

32. 准军事团体继续扩张到新的地区并巩固了它们在已占支配性优势的地区的存在。同时，它们也在处理内部的分歧，再三企图改变它们的公共形象，赢得更大的政治合法性以便在任何可能的和平过程中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参与者。鉴于新政府似乎愿意与所有非法武装集团对话，准军事集团制定了包括签订协定和进行谈判在内的战略。这种改变也是由于它们领导人所受到的外界压力，类如美国当局提出的引渡要求。

33. 准军事团体在争取合法性过程中，为了减轻屠杀等行为的影响，采取了有选择的杀人和死亡威胁的方式，并向队伍发出这方面的具体指示。它们将活动扩大到以前的“非军事地区”，Guaviare、Cundinamarca、Valle del Cauca、Sucre 和 Putumayo 等新地区。同时，它们巩固了它们已在农村和城市地区进行的活动。这类活动超越纯粹的军事方面，并包括对平民人口的敲诈、更严格的控制、再加上对出入公路、政府机构和非法贩卖(古柯和走私汽油)，甚至农业、畜牧和商业活动的控制。准军事集团以这种方式成功地渗入了社会结构，占领了公共和私营部门。

34. 准军事团体的行动继续得益自该国若干区域中政府官员的不采取行动，宽容或同谋。在这些地区里，准军事集团在公共领域的各个重要方面，包括军队方面，取代了政府。

(c) 保安部队

35. 由于武装冲突恶化，战斗增加，部队的重新分配和不同的非法武装集团的存在，保安部队不得不重新制定它们的战略和政策以应付冲突。在和平谈判破裂后，特别是在该年下半年，保安部队加强了它们对游击队的进攻，导致其队伍严重的损失。军队的机动部队从监测和遏制转向直接对抗。在许多场合，军队直接与民族解放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交战，在若干省份，特别是东 Antioquia 和 Urabá、Arauca、Casanare 和 Nariño 发生重大的战斗。<sup>4</sup> 在发动这些新攻势同时，军队增加用来保护公共基础设施的部队人数。然而，在一些其他省份，诸如在 Chocó、Cauca 和 Caquetá，军队只作出有限的防止性努力，反应极慢。有报导指出在一些行动中，未能确认保安部队的身份。

36. 根据国防部，保安部队从 1 月至 10 月间的行动导致颠覆部队中被俘虏和杀伤的人数显著增加。然而，在保安部队俘虏的人数和杀伤的人数中，准军事集团所占百分比各自为 26% 和 11%。必须铭记的是这类统计数字难以核实，因为没有办法知道有多少人真正是非法武装集团成员，多少人是在被俘虏后释放的平民。

37. 在上述军队执行新攻势战略的地区内，有人申诉在某些场合由于未能区别战斗人士和平民，造成许多平民人口受害。在这方面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对所谓的游击队平民“支助网”的攻击；这是在国内动乱情况期间作为反暴动战略的组成部分通过的措施中所包括的目标之一。军队在没有保证区别原则情况下截断游击队供应线的战略在若干场合，由于对粮食、汽油和其他必要物资的运输进行封锁而为平民人口带来困难。在 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 和在 Chalán (Sucre) 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军事情报方面的缺陷导致平民人口得不到充分的警告和保护，未能执行区别原则以及采取了可疑的打击暴力方法，诸如建立线人网和进行大规模袭击。

38. 值得注意的是准军事团体曾有数次进入和进驻保安部队刚进行了反暴动行动的地区。例如在 Mesetas、Vistahermosa 和 San Vicente del Caguán (前非军事区)等城市，在 Ocaña 省(Santander 北部)、在 Curillo (Caquetá)和在 Cravo Norte、Puerto Rondón 和 Tame (Arauca)等地和在 Medellín。

(d) 和平谈判过程的重要性

39. 建立和平的企图屡次遭到挫折的原因可能部分地在于对解决办法普遍采取一个单一的看法。它的一个基本限制是欠缺任何全面的展望，这主要是因为军事办法被认为是该问题的主要或唯一的手段。值得提醒的是一旦武装冲突中止，侵犯人权事件就会大量减少，并会制止对人道主义法律的违反。如果在和平谈判中纳入基本人权问题，就可改善这种情况。联合国秘书长通过其特别顾问进行的斡旋，可有助于建立政府、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和民族解放军之间的和平谈判。

40. 一项谈判过程应该具有适当的范围和标准以避免谈判失败；谈判失败了显然会令公众失望，导致保安部队恢复镇压行动。所需要的是一个有适当结构的实质性谈判过程，从一开始就将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方面的承诺纳入其中。另一个可保证持久和平的关键因素是考虑收编反叛部队的可能性和考虑和解的问题，这方面应拒绝逍遥法外的情况并尊重真理、司法和赔偿的权利。

#### 四、人权情况

41. 在分析人权情况之前，<sup>5</sup> 值得阐述适用于该题目的概念范围。影响国际人权和国际刑法文书中或一般国际法律标准中列出的权利的行动和不作为，<sup>6</sup> 如果是由公仆或在当局同意下作出，就构成了对这些文书和标准的侵犯。在没有遵守保障义务时，而这种不遵守不是故意的，在作出这些行为上或掩盖这些行为上也并没有涉及政府官员，那么在這些侵犯方面的责任只在于失职。当政府人员牵涉进筹备或作出一个行为或掩盖该行为或保护罪犯时，这种责任就是违反行为。

42. 人权情况仍旧相当严重。最受到影响的是生命权、身体完整权、自由权和正当司法程序权。有记录显示在下列方面发生了严重违反事件：法外处决、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不必要或过份地使用武力、强迫失踪、非法或任意的拘留、非法阻止国内的自由迁徙、强迫流离失所、任意或非法干预私生活和家庭、违反司法保障等。基于其严重、巨大或一贯的性质，许多这类侵犯行为相当于危害人类罪行。



43. 人权情况继续受到武装冲突的重大影响。非法武装团体，特别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和民族解放军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攻击破坏了政府提供保障和保护的能力。新政府指出：“国内武装冲突，其加强和恶化、国家在国境和司法上的脆弱以及缺乏任何人权文化是这些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基本原因。”同时，它也承认它在应付该危机时的不当之处，它提到诸如“欠缺机构间协调、行动分散和人权政策没有充分下放”等问题。<sup>7</sup> 这一危机的形成也是由于就这个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整体政策。新政府已指出它有意遵守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义务和宪法义务。

44. 在这个危机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人申诉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受到保安部队，主要是在它们执行保安政策和紧急措施过程中的直接侵犯。一些被报导的侵犯行为被直接归咎于政府官员。在其他情况下，政府必须为其官员对准军事团体不采取行动、容忍、支持或同谋而负责。主要的受害者为人权捍卫者、工会领导人和土著人民、非裔哥伦比亚人和农村社区人员。

45. 对生命权的侵犯包括针对个人和集体的法外处决和死亡威胁，过去一年来死于法外处决的人数稍有减少，然而必须指出全国的杀人率继续在增加。根据副总统办公室，很难确定在 1 月至 10 月间发生的 23,354 宗杀人案中有多少宗为侵犯人权案和战争罪行，有多少宗为普通罪行，因为欠缺官方统计数字，以及许多这类行为没有受到惩罚。屠杀继续发生，虽然被杀者现在似乎更多是个人或有选择的目标。这类侵犯的报导包括直接由保安部队执行的处死和屠杀。在准军事团体所执行的处死和屠杀方面，政府被指责没有采取行动或参与同谋。

46. 作为保安政策而采取的一些程序，如搜查和逮捕导致了平民的死亡。在其他情况下，这些程序通过任意剥夺自由和强迫失踪等方式影响了个人自由和个人安全权，以及隐私权和住家不受侵犯权。后者包括 10 月份在麦德林的 Orión 采取的行动，其他案件影响到社会、人权或和平组织的权利。

47. 在一些情况下，归咎于政府官员的行动使人权捍卫者和工会成员的生命受到威胁。在其他情况下，保安部队成员据称对平民人口进行直接恫吓；他们不是指控人民同情或协助游击队伍就是恐吓他们准军事人员将立即到达。

48. 人身完整权受到了不必要或过份地使用武力的侵犯，也受到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酷刑的影响，特别是在监狱叛变、平民罢工、袭击和搜查的情况下。

49. 适当法律程序，尤其是法律原则、无罪推定和其他司法保障方面受到了侵犯，因为第 2002 号法令授权包括军队在内的保安部队成员在法院的书面或口头允许下，不需逮捕或搜查令就可进行搜查和俘虏。违反了必须有律师在场的规定以及由一个合格、独立和公正的法庭审讯的权利也受到侵犯；并继续存在获得司法的困难。

50. 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主要关切仍旧是该国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排他性、高度的贫困和巨大的不平等。工作权利受到了高失业率、就业不足、打黑工和脆弱的退休金制度的影响。尽管近年来在教育方面作出的努力，还是未能做到普遍教育和减少文盲。保健范围扩大了，但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仍旧存在很大的差异。公共房屋的建造有所增加，但房屋津贴却大大减少了。在这方面最受影响的群体包括流离失所者、儿童、妇女和种族少数。

51. 在妇女权利方面，尽管在立法上获得一些进展，但仍旧发生歧视、不平等、排他、家庭和性暴力及人口贩卖的问题。妇女占哥伦比亚人口的 52%。<sup>8</sup> 哥伦比亚政府拥有一些法律工具可用来保障男女平等、根除对妇女的暴力、消除引起歧视的情况和在决策阶层促进妇女充分和有效的参与。<sup>9</sup> 在这方面，高级专员办事处欢迎目前正在议会审议的平等机会立法草案。然而，妇女在公共事务方面还是只能发挥少数的作用。她们在高等法院和议会中的人数仍旧不足。<sup>10</sup>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13 个部级官员中有 6 个是妇女，包括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国防部是第一次由妇女出掌。

52. 武装冲突继续影响妇女，显示了流离失所妇女的特别脆弱性，以及有必要制定具体的国家方案适当地处理这一问题。

53. 特别令人关切的是缺乏有关妇女权利的全面政策。也就是说欠缺预算、行政和技术独立。这就妨碍了发动任何旨在改善妇女情况和促进她们充分享有她们权利的方案和项目。同样地，哥伦比亚办事处没有看到政府采取有效行动来调查和惩罚对妇女权利的侵害。<sup>11</sup>

54. 儿童权利继续受到下列方面的侵害：家庭暴力、性虐待、童工、歧视和只能有限度地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 五、 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方面的情况

55. 在分析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情况之前，<sup>12</sup> 必须先为该题目设定概念上的界限。在哥伦比亚武装冲突中，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违反主要是对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所共有的第三条及对其第二份附加议定书、及对国际刑法和国际习惯法的违反行为或不作为，这些行为或不作为大多数是直接参与冲突的各方所犯下的。在哥伦比亚，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同样也适用于国家、游击队和准军事人员。

56. 武装冲突的恶化导致了更多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事件和更多的受害者。这些违反行为包括屠杀、对平民人口的攻击和任意性攻击、恐怖主义行为、劫持人质和强迫流离失所。许多这些违反行为由于是一项计划或政策的一部分并且大规模地发生所以是战争罪行。确实其中某些行为可构成危害人类罪。非法武装集团对妇女和儿童的攻击继续发生。儿童特别被征入伍和被迫参与敌对行动，而妇女则主要受到性虐待和奴役。

57. 虽然被屠杀的人数估计有所减少，因暴力死亡的人数继续增加，在这方面值得指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侵犯有所增加，这方面包括恐怖主义行为、死亡威胁、选择性杀人、“社会清洗”以及任意性攻击。这种攻击的最严重一宗于 2002 年 5 月 2 日发生在 Bajayá (Choc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在与准军事人员冲突时投掷的一个煤气缸炸弹在一群平民避难的教堂中爆发，导致 119 名平民死亡。<sup>13</sup> 民族解放军也曾犯有若干这类行为。而且非法武装集团对医疗人员和单位进行攻击、劫持人质和征募未成年人的事件也增加了。准军事团体继续进行屠杀，虽然它们较多地采用选择性杀人和“社会清洗”的方式。非法武装集团，特别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采取了新的压力战略，其中包括对市长和市监察员等公共官员的威胁和攻击，对地方上的民主引起严重破坏。

58. 有关保安部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报导也增加了，特别是在区别原则、限制原则和相称性原则方面，国家为了防止平民对非法武装集团提供支持和供应，在其政策中增加了所有武装集团普遍使用的路障：例如 9 月份和 10 月份在 Urrau (Antioquia 东南)和 Bahía Solano (Chocó)以及在 Atrato 河地区。实际上在第 2002 号法令中已建议了这种解决问题方法。该法令指出犯罪集团混合在平民人口中。另一方面，国家显然未能防止非法武装集团的攻击或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反攻。政府自己承认，其防止机制的效力很有限。<sup>14</sup>

## 六、引起特别关注的领域或重要的领域

### 1. 法治与安全政策

59. 严峻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局势，加上武装冲突恶化，加剧了治理问题和法治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包括非法武装团体的滥杀滥伤行动和政府对国内几个地方缺乏控制。准军事团体的策略仍然是篡夺本来属于国家的职能，利用政府当局和一些社会阶层的容忍或消极态度。它们在其控制的几个地区扩大并巩固准军事力量，因而能够将渗透国家体系作为其战略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几个地区建立了一种平行的国家，因此对继续推行法治造成了极大的隐含的危险。这种事实上的篡夺国家职能的也许最公然的迹象是它们如何将行为守则强加于全体人民，但这绝不是唯一的迹象。哥伦比亚办事处所收到的资料控诉说，市政府或省政府的决定必须得到准军事团体首领的批准，在选择资金领取者方面施加压力，指示资金应用于何处和如何使用，或者要求通过准军事团体控制的组织输送公共资源。

60. 法治的薄弱点还明显体现在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划分及其各自活动范围各自为政的问题上，这方面受影响最大的是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进一步的危险是一些政府政策引起的，特别是那些旨在加强压制性对策而妨碍加强民事机制的政策。在这一方面，上一届政府通过的《安全与国防法》<sup>15</sup> 被宪法法院宣布为不符合《宪法》和法治。

61. 新政府在国内几个地区着手恢复国家权威。它根据“民主安全”的政策宣布了内乱状态(紧急状态)，对基本权利和自由实行限制。高级专员办事处承认国家有正当的权力以符合国际承诺的方式就安全与公共秩序采取措施和政策。但這些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行动方案如果没有辅之于全面的政策，就有可能削弱民事机制并导致保护和增进人权必不可少的机制的消亡，损害其职能或减损其权力。此外，这种政策有可能惩罚平民，特别是人权维护者等群体，而且可能违反不得使平民卷入冲突的原则。<sup>16</sup>

62. 人道主义危机使一些人忽视了为了限制其基本权利和自由而采取的措施乃至准军事团体的活动和政府官员与这些团体保持的联系。国家机构的削弱限制了其行使有效控制或充分执行安全政策的能力。此外，司法系统的削弱和有罪不

罚的问题使得有效地实行司法保障或运行作为民主的支柱之一的独立和不偏倚的司法系统的前景暗淡。

(a) 内乱状态

63. 哥伦比亚办事处按照其职权就在内乱状态下采取的规则和措施是否符合该国政府的国际义务的问题提供了咨询。它就 2002 年第 2002 号法令的一些规定发表了意见，该法令规定设立恢复和巩固区(特别公共秩序区)，并违反国际原则限制迁徙和居住自由权、尊重私生活和住所权、个人自由权和正当程序权。正如本报告第三章和第八章所述，11 月 26 日，宪法法院宣布该法令的几条条款不适用。

64. 根据这些规定，政府当局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执行了一项大规模搜捕和大规模逮捕的政策。办事处收到的一些报告控诉保安部队的侵权行为和不符合国际原则的程序，例如加以保护免遭任意拘留的原则或合法性和推定无罪的原则。这些报告还质疑司法和监督机构的行动，特别是司法部长办公室的行动，指责它们缺乏独立性，未能执行正当的批准拘留的程序，而且出动带着头罩的人进行搜捕和抓捕。

65. 鉴于实行紧急状态的时间很短，得出任何稳妥的结论都为时过早。但高级专员办事处希望表示，它关注不是以合法性原则为基础而且摆脱法院和公共检察厅事先和事后独立监督的措施引起的滥用和任意使用武力和侵犯正当程序和其他基本权利的行为。这方面的主要关注着眼于以适当的手段确保有效的独立的国家监督的必要性。此外必须认真和负责地审查这样的问题，即平民、特别是人权维护者、社会领导人和流离失所者等群体可能会受到过分的影响并变得越来越易于受害。

66. 值得一提的是总检察长 9 月 12 日第 011 号指示，其中他指示其下属工作人员和负责保安部队的机关随时向他通报在执行第 2002 号法令过程中遵守国家和国际人权标准的情况，并命令他们立即报告所有没有逮捕证而执行的逮捕、审查和搜查。

(b) 恢复和巩固区

67. 第 2002 号法令规定设立的地区里的保安部队的行动没有受到法院和检察厅的充分有效的监督，这些行动往往集中在较大的城镇里和某些城市里。尽管任命了检察官和公诉人来按照该法令监督军事行动，但实际上仅仅介入很少的案件。

68. 保安部队在许多行动中利用该法令授权他们未经批准执行逮捕、搜捕和搜查的权利(后来被宪法法院宣布为不合宪法)；因此许多人遭到拘留。而迄今只有少数人被送交法院。在几起案件中，利用带着头罩的告密人损害了他们挑选出来的个人的名誉。11 月 12 日和 13 日在 Saravena (阿劳卡)逮捕了大约 2,000 人，他们中 49 人受到起诉，其中将近 20 人参加了社会或工会组织。同样在 Saravena，告密人的至少五名亲属被游击队团体枪杀。此外，据报告，军队严重侵犯人权，包括枪决，尤其是在 Arauquita，在设立这一地区以前早已发生了类似的问题。

69. 与此同时，随着保安部队在包括通常受到游击队控制的地区的恢复区加紧反叛乱行动，准军事团体渗透到一些地方，例如 Sincelejo 镇和苏克雷其他市，例如 Chalán 和 Ovejas。在 Arauca 等其他地方，尽管展开了军事行动，它们仍然保持其存在。

(c) 原非军事区的局势

70. 随着非军事区结束以后政府恢复控制，政府当局的存在很有限。这种存在的形式是主要是保安部队，这支部队在城市里积极活动，偶而在农村地区进行活动，有时成了国家权力的唯一形式。先前存在的市政当局由于普遍的不安全局势而被削弱，有时市镇长和市监察官被迫远走高飞。永久性的司法和监督机构也从未重建，在国际支持下坚持到 11 月底为止的监察官办公室在这一日期以后无法留在该地区。

71.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人民军对该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平民进一步施加压力并采取暴力行动，进行有针对性的枪杀，限制交通，强行招募，并在实施地区发起恐怖主义行动。

72. 人们还注意到，从 9 月底以来，准军事团体主要聚集在 Mesetas、San Vicente del Caguán 和 Vistahermosa 城市边界内，人们还严厉控诉它们与保安部队成员勾结。

73. 因此平民除了受到军队的破坏以外，还仍然极有可能受害于非法武装团体的活动，而官方机构，特别民事机构的存在很薄弱，而且无所作为。原民事警察成员的境况也特别严重。

#### (d) 准军事体制

74. 就法治而言，准军事活动仍然是一个破坏稳定的因素，特别因为政府官员与准军事团体保持着联系，而且政府本身对这种局势采取的对策前后不一致。政府当局关于努力制止准军事体制的声明与哥伦比亚办事处根据本身的职权观察到的事实不相符合，这反映了政府所作承诺的含糊性。零星的军事行动，例如 8 月 9 日在塞哥维亚(安蒂奥基亚)展开的行动(该行动导致调查第 14 旅成员与准军事团体的联系)，或者偶而逮捕涉嫌的准军事团体成员，其在制止准军事团体现象方面所起的作用令人怀疑。准军事团体的控制在城市地区比较明显，而荒谬的是，保安部队和政府当局也在城市地区比较积极地活动；这始终是人们控诉政府官员与准军事团体成员勾结的一个内容。尽管众所周知，Cravo Norte 和 Tame(阿劳卡)和 Vigía del Fuerte(安蒂奥基亚)等地的准军事团体的存在令人担忧，但民事和军事当局矢口否认准军事当局在这些地区的存在。

75. 引起人们关注的部分原因是，政府对于人们不断的控诉和众所周知永久性的准军事基地、检查站和军事行动的存在往往未能采取行动。哥伦比亚办事处收到保安部队本身提交的报告，声称准军事团体即将抵达，有些人甚至报告说，当地居民辨认出准军事小分队中有武装部队的成员。同样表明这两者之间协调的事实是，例如在原“非军事区”阿劳卡、Valle del Cauca、Guaviare 和 El Catatumbo 等地，准军事团体总是在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后不久开进。进一步令人怀疑的是，士兵们有时没有佩带任何标志同其他武装团体区别开来。一个据报告政府当局未能采取行动的事例涉及到 Bojayá 的事件，在此之前，准军事团体的船只从图尔博沿着阿特拉托河前往 Bojayá，因此必须通过几个保安部队的检查站。据报告，有时保安部队不仅容忍或未能对准军事团体的活动作出反应，而且保安部

队同谋或直接参与这种活动，例如 8 月 31 日在 El Limón (瓜希拉)发生的大屠杀、7 月在塞萨尔发生的盗窃世界粮食规划署(粮食署)粮食供应的事件(曾归咎于准军事团体，但后由军队收回，然而军队声称，它是从游击队手里没收这些供应品的)，5 月 9 日和 10 日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和武装部队指挥员或成员在 Vigía el Fuerte (安蒂奥基亚)会晤。

76. 该国政府采取的应急措施或安全措施很少是为了与准军事团体直接对抗。例如，据办事处自 2000 年以来的报告，一个准军事基地设在 Montes de María 瓜莫市，而恰恰在现行的恢复和巩固区内，但政府从未对此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准军事团体甚至在附近的几个市里巩固其存在。该国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 10 月采取的奥利安行动以后的麦德林，准军事团体在第 13 区各地定居下来，虐待和严重侵犯平民。

77. 绝大多数这些案件都不了了之，而且政府官员从未由于与准军事团体和行动的牵连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关于制止这种情况的承诺的一个令人怀疑的方面。此外，正象下一节所提到的那样，将几起此类案件提交军事法庭审理，减损了调查的独立性并限制了调查的有效性。这些因素妨碍维持和建立民主的尊重法治的体制基础，并证实了人们的印象，即准军事团体现象在一部分人中受到容忍，甚至得到认可。

## 2. 司法裁判和有罪不罚

78. 2002 年，人们仍然对与法治和民主密切相关的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表示关注。在司法部长办公室缺乏任何司法界升迁结构的情况下，不可能达到适当的条件使这种独立性行之有效。<sup>17</sup> 办事处所收到的报告控诉有些检察官根据司法部长的任意决定而被解除职务，包括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股的几个人。<sup>18</sup> 该股的几名检察官被解除职务或调任，这似乎损害了该股累积的经验及其调查的有效性，同时对该机构作出的关于制止侵犯人权行为不受惩罚现象的承诺提出了疑问。另外还影响到该办公室和国际社会提供的技术合作的有效性。

79. 此外，司法部长办公室作为独立的司法控制的关键机构，支持将司法警察职能移交给保安部队(包括军方)。司法部长本人在就被宣布违反宪法的《国家安全法》和第 2002 号法令作出评论时表示过这种意见。在履行其监督对紧急措施的



宪法保障的过程中体现了这种立场。在这一方面应该指出，在关于司法部长办公室的宪法的改革提案中增加了一个条款，允许军方行使司法警察职能。最终这一条款没有得到批准，但该国政府重申它准备在议会下一届会议上重新提出这一条款。

80. 由于实施了紧急状态，司法裁判不得不面临着重大的挑战，特别是关于推定无罪和合法性原则、以及在有无逮捕证的情况下，抓捕、搜捕和搜查时辩护和正当程序的权利。有人控诉说，当局根据匿名报告或仅仅根据怀疑就将人逮捕，因此对以下要求提出了怀疑：即这种对自由的限制必须以与非法行为的联系的客观证据为理由。公共辩护系统等其他方面受到的预算限制影响到取得法律辩护的权利。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关注的是，缺乏这种服务可能会对受到一般或紧急措施影响的人享受的司法保障产生影响，而且司法监督可能会由于这些事态发展而受到损害。

81. 10月，该国政府向国会提出了一份改革司法制度的法案。该法案包括对宪法权利保护程序严重的宪法限制，将从取得有效、迅速和简单的补救措施的权利中排除对平等和不歧视原则等基本权利的保护、对儿童的保护、妇女的权利、健康权利和其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护。该法案拟议削减宪法法院的权力，特别是其审查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因此可能会削弱司法监督并使合法性原则和法治取决于政治决定或文件。<sup>19</sup>

82. 关于制止有罪不罚现象，正如下文第七章所表明，在本报告所涉期间，国家政策似乎已经削弱。有罪不罚现象时常发生影响到司法裁判。在这方面，办事处看不到在对造成严重侵犯人权的政府官员进行刑事审判或纪律惩戒方面有任何重大的进展。<sup>20</sup> 由于军事法院的介入或由于司法部长办公室或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决定，有些被指控与准军事团体有牵连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现役或退休的高级军官逃脱了司法诉讼。<sup>21</sup> 尽管对其管辖权作了限制性宪法解释并修订了军事和普通《刑法》，军事法院继续调查保安部队成员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案件。<sup>22</sup>

83. 国内武装冲突和被禁止的团体的非法活动在口头上和实际上威胁到司法官员和参与审判程序的其他人的生命和安全，因此严重影响到受害者取得有效和独立的司法的权利。

(a) 监狱的情况

84. 为了应付监狱危机，该国政府着眼于建造看守所关押囚犯，并重新设计其他设施来关押被告。

85. 由于缺乏统一的信息系统，因此对拘留情况进行监督极其困难。尽管当局已经将一些囚犯转送出去，以便将已被定罪的被拘留者同被告分隔开来，例如巴列杜帕尔监狱就是如此，但根据国家监狱和感化研究所的资料，一些监狱极为拥挤，有时超过其正常收容能力的 100%。过分拥挤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86. 办事处收到的许多报告控诉监狱当局滥用职权，通常是监狱看守实行惩戒办法或使用武力，而这种行为可以视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甚至侵犯生命权。办事处获悉，有时过分的武力可能造成受害者死亡，例如 Luis Preciado Osorio 于三月死于巴列杜帕尔国家监狱。

87. 由于缺乏一项全面的政策，监狱当局在应付当前数量有限的一些犯人不安全和难以管教的问题方面往往仿效政府的榜样，损害了确保所有被拘留的人受到人道和体面的待遇的一般义务。司法部和国家感化和监狱研究所宣布，它们将采取一些措施来改进该系统的运作。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监察官办公室去年提出的关于监狱情况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在此基础上并参照其他建议，就可以对监狱系统实行必要的变革。

3. 被迫流离失所

88. 被迫流离失所现象急剧上升，殃及该国许多地方，<sup>23</sup> 原因是被迫流离失所越来越被当作为一种战争策略。这一年令人不安的一个特点是城市内流离失所现象有所增加。根据社会团结网<sup>24</sup> (以下称为团结网)的资料，在 2002 年前九个月里，准军事团体造成 30%流离失所现象，而游击队造成 14%的流离失所现象。只有 1%的流离失所归咎于武装部队。据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武装派别应对 52%的流离失所案例负责。

89.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因素是政府未能制定任何全面的预防政策。另一个因素是将造成流离失所现象的人绳之以法方面缺乏进展。根据团结网资料，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大约 231,000 人流离失所，但根据人权与流离失所问题咨询

办公室(Consultoría para los Derechos Humanos y el Desplazamiento, 流离失所问题咨询办公室(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统计, 同一时期流离失所人数超过 35 万。尽管由于单一登记系统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原因而改进了覆盖范围, 但取得国家方案和持久解决办法方面仍然存在障碍, 而且难以行使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特别令人关注的是流离失所妇女、儿童、土著人和非裔哥伦比亚人的境况。

90. 团结网建议改进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和国家流离失所者全面照料系统的充实, 但后者由于其参加实体的承诺参差不齐而受到阻碍。此外, 尽管团结网站展开了努力,<sup>25</sup> 但一些省市参加福利方案的的程度仍然很低。1997 年第 387 号法令规定, 对流离失所者的援助取决于国家机构预算资金的供应情况。所调拨的资源与受援者的需要不相吻合。

91. 防止流离失所现象仍然是流离失所问题政策最薄弱的环节。鉴于这种现象在地理上的蔓延, 政府显然无力确保危难社区的安全。有时在应付流离失所危机时, 对军事安全的关心和维护基础设施优先于对平民的保护。

92. 监察官办公室增加了其对国内一些地区的援助和保护, 例如太平洋沿海地区一些危难社区, 并在组织预警系统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有限的预算使它无法在所有危难地区保持有效的存在, 也无法追踪当局对所有收到的关于迫在眉睫的危险的报告所作的对策。

93. 流离失所者重建社会经济基础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sup>26</sup> 但由于分配的资源不足、付款缓慢、难以取得信贷和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三个月的限制等原因, 这种进展是有限的。

94. 各种情况下的返回难民没有取得适当的安全和体面的条件。<sup>27</sup> 国家当局提供的援助不足, 而且由于信息匮乏和缺乏重新安置设施或扩大的人道主义援助, 其承诺往往流于形式。

#### 4. 族裔群体

95. 族裔群体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继续遭到侵犯, 特别是生命权, 并遭到种族歧视、不容忍和社会排斥, 他们生活环境中的贫困和排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武装冲突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境况, 威胁到其中一些群体的生存。

96. 特别令人关注的是非裔哥伦比亚人社区的情况，他们被认为是该国最贫困的群体之一。根据监察官办公室的资料，98%的非裔哥伦比亚人得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而80%的住房条件很差而且过分拥挤。在非裔哥伦比亚人占人口90%的乔科省，82%的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

97. 此外，非法武装团体试图保持对其领土的控制而引起了一些问题，因此侵犯土著人和非裔哥伦比亚人社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现象更加严重。他们往往遭到经济封锁，粮食和药品供应受到控制，自由迁徙受到限制，所有这些情况只能恶化他们所在地区的困难条件。<sup>28</sup> 武装团体在这些社区领土上的存在也影响到他们的独立的权利，威胁到其当局治理的能力并侵蚀其文化属性。

98. 在这种暴力背景下，土著人和哥伦比亚非洲人社区，特别是领导人继续遭到法外处决、屠杀、死亡威胁、强迫失踪和被迫流离失所和招募，因此其作为族裔群体的存在及其文化生存受到威胁。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造成的侵权行为包括，4月9日，Embera Chami领导人 María Fabiola Largo Cano 在 Riosucio 市(卡尔达斯)被谋杀，3月，四名土著人在科林托市(考卡)Gualandanay 遭到杀害，8月，Cofán 村(普图马约)的三名土著人失踪。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被指责于3月在科林托市(考卡)威胁北考卡土著首领协会(Associación de Cabildos Indígenas del Norte del Cauca)，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和民族解放军被共同指责于6月和8月对 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 土著社区进行死亡威胁。哥伦比亚办事处所收到的报告指责保安部队直接参与，例如准军事团体于8月31日在利蒙和附近地区(瓜希拉)屠杀了12名 Wiwa 土著人。<sup>29</sup> 关于非裔哥伦比亚人，应该提到图马科(纳里尼奥)埃尔蒂格雷居民的命运，那里每天发现6到10具尸体，据认为是被自卫团体处决的人。

99. 这些族裔群体由于其文化同其土地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受流离失所现象的影响特别大。由于非法武装团体持续不断的威胁，人们特别关注已返回其原籍地但没有得到适当安全保证的流离失所者的境况，尤其是阿特拉托河两岸和 Salaqui, Truandó, Quiparadó, Domingodó, Curvaradó 和 Jiguamiandó 河沿岸的和平社区里，因而加剧了进一步流离失所的危险。<sup>30</sup>

100. 参与影响到自己的决定的权利，特别是事先磋商的权利仍然受到该国政府的忽视，而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具有重大影响的发展项目的决定更是如此。办事

处收到的证据表明，土著人和非裔哥伦比亚人社区居住地的熏蒸由于毁坏作物并使土地贫瘠化而影响到环境和当地居民的粮食安全。这种情况出现在考卡省、北桑坦德省和普图马约省。

101. 在根除在劳力市场上或行政援助程序上对 raizales 人(San Andrés, Providencia 和 Santa Catalina 西印度后裔克里奥尔语和英语居民)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罗姆人(吉普赛人)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而且受到歧视、边缘化并在社会上受到污辱，而且受害于武装冲突。

## 5. 人权维护者

102. 2002 年后期，人权维护者的情况仍然很严重而且恶化。日益恶化的武装冲突特别影响到社区领导人、工会活动家、人权维护者、社会组织成员和负责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政府官员。这些群体的成员遭到谋杀、威胁、袭击、骚扰、强迫失踪和劫持。人们将多数这些侵权行为归咎于准军事团体。另一方面，对监察官和其他地方当局的袭击应主要由游击队团体承担责任。有几起案件中，人们指责政府官员威胁人权维护者并造成他们的弱势地位。

103. 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是一些人权组织成员的境况，例如声援政治犯委员会基金会(Fundació Comité de Solidaridad con los Presos Políticos)和 José Alvear Restrepo 律师协会，他们有时由于反复受到威胁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务。<sup>31</sup> 在巴兰卡维梅哈镇，继续发生严重袭击和威胁人权维护者的事件，特别是妇女民众组织(Organización Femenina Popular)和区域人权维护社团(Cororación Regional para la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的成员。这种案件包括 4 月份妇女民众组织的一位活跃分子 Diofanol Sierra Vargas 死亡，2 月份 Ciénaga de Opón 流离失所社团领导人 Manuel Francisco Navarro Culma 失踪，均归咎于准军事团体。另外值得注意的是，Café Madrid de Bucaramanga 社区行动团体主席和独立的社区领导人 Guillermo Torres Valdivieso 于 8 月 12 日失踪。

104. 市监察官作为在许多城市里增进和监督对人权的尊重的唯一负责人，受到特别大的压力，在收到据认为主要来自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死亡威胁以后往往被迫离开其所在地区。特别是在阿劳卡和卡克塔，有些市长、镇长和议员死

亡而且有几人由于受到死亡威胁而被迫离开省行政中心，这使得局势更加恶化。因此该国政府决定将这些地方人士纳入内务部保护计划。

105. 办事处所收到的几份报告说，政府当局对人权维护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的委任和合法性提出质疑。6月24日，高级专员通过本人的一项证明作出了回应。政府官员关于人权维护者的评论和对他们予以的关注，除了产生损害名誉的效果以外，实际上危及他们的生命和人身健全。<sup>32</sup> 尽管第07/00号总统指示允诺国家对人权组织予以支持，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纠正这种态度，也没有惩处任何违反该指示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基夫多主教管区社会神父教长 Jesús Albeiro Parra 神父案件，他由于批评安全部队未能在 Bojayá 事件前后采取行动而被第4步兵旅 Mario Montoya 将军提起诽谤诉讼。武装部队高级军官采用的这种控告申诉者的办法<sup>33</sup> 令人担忧，因为这妨碍了报告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任务，而这正是人权维护者工作的基本内容。

106. 由内务部长负责的《人权维护者保护计划》继续在行政上、手续上和操作上遇到困难。特别令人关注的是，该保护计划所包括的哥伦比亚山脉一体化委员会(Comité de Integración del Macizo Colombiano)领导人和董事 Enoc Samboni 于1月12日死亡，据称是准军事团体所为。

107. 新政府就职以后不久几位官员发表了令人遗憾的讲话，加剧了人权维护者的境况。有些高级专员表示不赞成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及其使命带来的影响。这些讲话有时带有非常模糊和任意的说法，给人权与和平组织带来了恶名，危及了所有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生命和安全。非政府人权组织要求新政府在它们与政府机构之间建立永久的联系。高级专员办事处注意到负责执行国家人权政策的共和国新任副总统表示的诚恳态度。

108. 大规模搜捕的政策也影响到人权维护者。司法部长办公室根据警察和军方情报人员的报告批准了几次搜捕，而这些报告有时提到模糊地称为“非政府组织”的大楼。特别令人关注的一个事件是，10月份民间社会争取和平常设大会总部遭到搜捕，但结果是一无所获。考虑到象波哥大这样的城市里交通很方便，批准这次搜捕的司法部长办公室代表和公共检察厅代表不在场是很难为之辩解的。<sup>34</sup>

## 6. 基本自由

### (a) 结社自由

109. 工会活动家继续遭到暗杀、威胁、袭击和失踪，多数这些事件至今没有受到查处。据统一工人联盟(Cenreal Unitaria de Trabajadores)称，1月1日至10月15日期间，118名工会成员被杀害，18人遭到殴打，32人要么被绑架，要么失踪。受害最大的工会部门仍然是教育和卫生，具体地来说，是卡利市政工人(SINTRAEMCALI)、卫生部门工作人员(ANTHOC)、教育工作者(FECODE)和农业工人(FENSUAGRO)等工会。这些侵权行为多半是准军事团体所为。<sup>35</sup> 个别案件包括侵害联合劳工联盟(Unión Sindical Obrera)领导人和成员，<sup>36</sup> 例如内务部保护计划所包括的 Jaime Torra 于3月20日在巴兰卡维梅哈(桑坦德)遭到谋杀，以及 Gilberto Torres 于2月份被 Casanare 南部农民自卫团体(Autodefensas Campesinas del Sur del Casanare)绑架，后来由于当局的调解而获得释放。另外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人员和雇员联盟潘普洛纳分部主席 César Gómez 于9月5日在北桑坦德遭到暗杀，据说是准军事团体所为。尽管保护计划由于 Gómez 面临着严重的危险而决定采取行动，但由于缺乏资源而不了了之。<sup>37</sup>

110. 政府官员的声明带来的恶名危及一些领导人的生命并使人们对工会运动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这既不利于自由行使工会领导人作为工会权利维护者的职责，也不利充分享受结社自由。政府官员令人遗憾的评论也影响到工会成员和行使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在9月16日举行的罢工及其筹备过程中人们坚决反对对工会领导人的诋毁发言、威胁和逮捕。<sup>38</sup>

### (b) 见解和言论自由

111. 侵犯新闻工作者的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侵犯了见解、言论和新闻自由。据副总统办公室称，2002年1月至8月期间，有9名新闻工作者被枪杀。非法的武装团体也发出死亡威胁，迫使一些新闻工作者寻求政治庇护或暂时离开该国。这些事件加上当时情况下产生的严重的有罪不罚和敌对的气氛影响到人们接收公正客观信息的基本权利和新闻工作者充分言论自由的权利，而这正是任何民主社会应该予以保障的。另外缺乏各种新闻来源提供的明确和准确的信

息，新闻媒体众口一词，自我新闻检查，有时缺乏广泛的新闻报导，也影响到这些自由。

112. 言论自由是与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后者受到内乱状态，特别是受到第 2002 号法令规定的影响。9 月 16 日举行全国性罢工时，当局采取步骤限制动员工作。据报告对示威者采取了行动并过分使用了武力，而军队设置了检查站。有人控诉说，当局于 9 月 20 日任意逮捕了一个由非政府组织、工会和考卡山谷监察员办公室组成的人道主义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从卡利前往考卡支持一次农民游行的。

#### (c) 良心和宗教自由

113. 侵犯宗教代表权利的问题引起了关注。天主教许多教徒遭到非法团体的杀害、威胁或绑架。多数这种案件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包括 11 月 11 日绑架 Zipaquirá 主教。2002 年 9 月 27 日 Restrepo(山谷)教区牧师被暗杀是准军事团体所为，而 9 月 20 日麦德林市 13 区社会和宗教领袖 José Luis Arroyave 神甫被暗杀是一个身份不明的非法武装团体所为。据司法部长办公室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策划并实施了 3 月 16 日在卡利谋杀 Isaías Duarte Cancino 阁下的行动。其他教派，包括五旬节教会和基督复临教会的信徒在行使其礼拜自由和传道自由时，而他们的牧师在展开牧师活动时遇到暴力。哥伦比亚国内法不准许依良心拒服兵役。

#### (d) 政治权利

114. 2002 年选举期间限制自由享受与见解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政治权利。宗教社团成员、流离失所者和其他无证件者是选举权受到限制的主要群体。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给候选人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其中许多人收到死亡威胁，或者准军事团体和游击队试图暗杀他们。参加选举的公众也受到这些团体的威胁和骚扰。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Ingrid Betancourt 和 Iara Rojas 于 2 月 23 日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绑架。一些政党的成员继续受到政治迫害，特别是爱国联盟的成员，他们遭到暗杀和威胁。这种情况历来已久，因此其成员队伍和政治参与和代表的范围年复一年地被削弱，而且该党在前几次选举中无法提出候选人。



115. 此外，市镇长和当地国家官员的权利遭到游击队和准军事团体的蔑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采取了一种袭击地方当局的策略，并宣布地方当局是他们的军事目标，对他们进行恐吓、死亡威胁，劫持人质和暗杀。<sup>39</sup> 因此许多地方官员放弃自己的工作或迁移到省府。<sup>40</sup> 这种情况削弱了国家的民事官员的存在和地方民主的行使，因此使平民更容易受到武装派别的压力。

## 七、对国际建议采取的后续行动

116. 遵照哥伦比亚办事处对国际机构(包括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就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提出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的任务，本节对哥伦比亚就各该建议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审查。

### 预防与保护

117. 该国政府承认预防措施是弱点之一，责任分散、信息系统不协调以及人权政策权力下放不够足以使预防机制留有空白并不能影响武装冲突的过程。<sup>41</sup> 因此，仍须采纳全面有效的机制。虽然预警系统几乎难于操作而且能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有限，但对领土进行报道的覆盖范围已经扩大，以用于编写风险报告和设立由副总统办公室、国防部和内政部策划的界定警戒状态的机制。

118. 2002年5月至7月间，在内政部的倡议下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支持和咨询下，就该国政府的保护方案进行了评估。但是，仍未能克服阻碍该方案的行政问题及官僚方面的困难。如果能有效落实评估中载有的各项建议，借助各组织和机构间的协调工作，则可望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就所建议的通过有效的预防性政策来支持这些方案，以减少对有关人口造成的危害，特别是公职人员的那些危及人权维护者和公民领袖人物的行动和言论所造成的危害而言，尚未取得任何进展。

### 关于武装冲突

119. 武装集团没有就尊重人道主义标准的各项建议采取任何后续行动。相反的是，尤其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民族解放军以及准军事团体而言，无视这

些标准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另外，它们不仅尚未释放人质而且还不断地实行扣留人质的可恶做法。

### 关于法治和不受惩罚

120. 应指出的是，响应加强法治尤其是打击准军事主义和防止准军事集团与公职人员勾结在一起，加强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打击法不治罪的现象的各项建议方面，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虽然宪法法院的裁决有所改进，但治安政策的各项规定和公共秩序的立法结果与国际建议和法治不一致。司法系统特别是检察院的改革也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 关于立法

121. 该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特别是有关批准重要的国际条约方面的步骤；但有些步骤尤其是关于治安、公共秩序和司法问题的国内立法，诸如通过上述第 2002 号法令等方面却有所落后。

122. 在积极方面，根据 2002 年第 742 号法，批准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但哥伦比亚政府援引该《规约》第 124 条宣布，哥伦比亚七年不会承认该法院对战争罪行的管辖权。宪法法院宣布接受认可《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的 2001 年第 707 号法，这为随后批准《公约》创造了机会。

123. 哥伦比亚政府既没有批准劳工组织《第 102 号公约》、《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也没有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也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和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的两项任择议定书。哥伦比亚政府不承认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或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准司法权限。

124. 根据宪法法院的决定应于 200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写入《刑事诉讼法》的改革人身保护令状的章程草案现正提交国会审理。草案仍保留了各项不符合国际标准的限制。

125. 值得注意的是，2002 年通过第 747 号法，该法除其它外规定贩运人口为犯罪。关于对种族歧视行为刑事定罪的问题，《刑法》仍忽视那些未直接参与

冲突的人任何时候卷入的歧视行为，而只将“在武装冲突期间和过程中”实行的歧视做法视为犯罪行为。

126. 遵照《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2002 年第 759 号法修订了《刑法》并对国家机构的合作和运作作出了规定。它设立了杀伤人员地雷观察处，并派出人道主义特派团核实情报和制定各项建议。

127. 《儿童法》中没有增加任何使其与《儿童权利公约》相一致的条款。“增设少年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草案已提交国会审理，但这一立法并未满足《公约》的要求。同样地，通过快捷有效的上诉保护儿童权利这一点可能因十月份提交的有关司法行政的宪法改革草案而受到影响，该草案呼吁将要求保护(行使)宪法权利这一权利排除在儿童权利之外。

#### 关于经济和社会政策

128. 这一年当中在扭转贫困与不平等不利趋势方面，该国政府既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措施，也没有实行任何指标或机制以改进对这些趋势的影响和后果进行的评估。尤其与弱势群体和区域相关的住房、工作、卫生与教育方面的政策与优先事项没有重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大部分建议。但是，该国政府实施的全国接种日却值得肯定。2002 年 12 月实行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改革似乎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应逐步发展这一国际要求不相符合。

#### 关于弘扬人权文化

129. 前政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国家行动计划纲要”以投入计划，并请办事处提交其意见。新政府现在已将计划的定义纳入全国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中，但案文有待完成和实施。另一方面，关于有效促进和平与人权文化的人权教育以及重申旨在反对歧视，尤其是反对歧视妇女、族裔群体、流离失所者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平等原则与机制的各项建议，仍是有效的。人们会注意到，该国政府缺乏任何关于性别问题的全面政策。

## 关于技术咨询与合作

130. 应指出的是，若干机构渴望通过旨在加强机构能力和培训官员的项目得到办事处的咨询意见与技术合作。前政府没有充分利用办事处根据其任务所发挥的咨询作用。新政府则表示有兴趣进一步发展办事处发挥的这一重要职能。

## 八、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在哥伦比亚开展的活动

131. 哥伦比亚办事处继续在所有工作方面，包括提出意见和法律咨询意见、开展技术合作及促进和宣传工作方面取得进展。办事处新主任十月中旬接管工作。提交办事处的各项投诉以及对哥伦比亚各不同部分进行的访问一直是收集资料 and 了解哥伦比亚局势的有用的途径。办事处在形成各项意见的过程中得到了设在卡利和麦德林分办事处的协助，这些分办事处不断地参与活动并开展各项工作。办事处共收到 1,435 项投诉，并对其中 1,106 项投诉进行了审理，同时进行了 183 次实地调查，在波哥大、卡利和麦德林之外的活动，平均期限为 2 至 4 天。

132. 办事处参与咨询活动，就国内标准和立法草案与国际标准相一致的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它还参加了各委员会和其他处理机构间事务的机构召开的工作会议，以便为当局和新闻单位就各项建议采取适当的后续活动提供咨询意见。

133. 办事处印制了数种出版物。这些包括一本关于解释国际人权标准的书(这些标准为联合国国际人权监督机构的意见、《德班宣言》和《行动方案》)和一本关于土著人民的权利的主题系列的新出版物。办事处更新和重新发行了其关于人权维护者和妇女权利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包括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哥伦比亚的报告。还编制了一本关于言论和见解自由问题的出版物。更新和发行了国际人权机构 1980 年至 2002 年间向哥伦比亚政府提出各项建议的光盘版并就同一主题设制了一个网页。办事处印制了 10,000 本以工人权利为主题的日历以及 30,000 本《世界人权宣言》儿童读本。

134. 就其促进和宣传工作方面的政策而言，办事处参与了许多活动(其中包括参加研讨会、论坛、讲习班和会议)。在与大众媒体打交道方面，办事处与记者

们组织了数次讲习班并印制了 37 份新闻稿。电视台播放了总计 270 份有关办事处和其开展的活动的公告，电台播放了 340 份，以及报刊刊登了 1,000 份。

### 1. 咨询和技术援助活动

135. 办事处已与新政府尤其与副总统办公室和外交部建立了频繁的联系。办事处关于进行技术合作的倡议鼓励国家、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积极投入与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和保障人权相关的任务。根据不同机构提出的建议，办事处制定了培训与机构支助项目。随着麦德林和卡利分办事处的设立，技术合作活动和对区域性倡议的支助有所增加。

136. 努力协调(2001 年开始的)国际人权合作被认为是优先事项。已邀请外交使团和合作机构更新由西班牙国际合作机构帮助制定的项目数据库，该数据库为人权领域的合作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指导作用。

#### (a) 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培训合作

137. 希望开展这些活动的要求源源不断且有所增长。这些活动是与以下实体一道开展的。

#### 检察院

138. 在瑞典政府的财政支持下，为全国 18 个城镇的检察院官员开设了人权与人道主义法课程。382 名公诉员和技术调查股的 320 名职员参加了该课程学习。在司法局和检察院的要求下，为 87 名公诉员和来自技术调查股、保安行政局及国家警察局的 93 名职员开设了人权与人道主义法课程。还将以这种办法向新一代公诉员和技术调查股职员提供培训，并将提高检察院指导员的网络。但令哥伦比亚办事处关注的是网络工作人员及那些参加课程学习的人员的工作没有保障，检察院刑事调查和刑事研究学校没有财力为其全部官员组织和继续培训课程。

## 市监察员

139. 欧洲联盟同意为市监察员人权培训方案的第二阶段(2002-2003)联合供资。现一共举办了 24 期讲习班, 参加人数为 432 人。该方案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其中制定了协商一致的战略, 以促进国家和公众了解到这些监察员作为体制化人权维护者的作用。当该国政府提议统统撤消市监察员时, 办事处为其增进和保护人权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辩护。

## 监察员办公室

140. 为国家公共宣传部的学术协调员以及监察员办公室的区域和部门维护者举办了关于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讲习班。42 名官员参加了讲习班, 其中 21 名官员被选为指导员。还为该部的 51 名管理问题咨询顾问举办了关于自由权的培训班。在加强和扩大监察员办公室人权维护者全国网络项目的第二阶段, 办事处为来自十所公立大学的 53 名人权问题讲师合作举办了培训班。

## 联合国系统

141. 为 55 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举办了两期关于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知识的基本培训班; 并举办了一次同一主题的复习讲习班, 共有 25 名联合国官员参加。举办这些培训班和讲习班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知识。

##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

142. 办事处支持执行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培训方案以及共同了解人权组织的体制能力在哪些方面需要加强而制定的方案。已为长期与这些组织进行交流作出安排。为从事人权宣传工作的人组织培训, 并反复举办培训班。对社会不同阶层的领导人进行培训, 为增进交流提供支助。

143. 为 Quibdó、Apartadó 和 Istmina 的主教管区举办了基本人权培训班, 共有 36 名从事人权宣传工作的人参加, 这些人继而为易受伤害的社区做了大量工作。在开展区域活动方面作出了更大的努力, 例如支助来自太平洋的与会者参加

第一届非裔哥伦比亚人国家会议、Chocó 民族间团体会议以及由“民族兄弟，有明显联系者兄弟会”网络举办的“处于冲突和被排斥的城镇”论坛。与荷兰广播电台培训中心签订了一项技术合作协定，安排对偏远地区的社区进行关于人权问题的广播。

144. 高级专员办事处通过为七个农村社区推广项目提供支助的方式在哥伦比亚执行了“共同帮助社区”(共助)项目。

#### (b) 体制建设合作

145. 12 月，办事处与国家监狱和教养所局以及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之间鉴定了协定。办事处的形势分析报告和建议为与这些机构执行新项目提供了依据。

#### 监察员办公室

146. 2002 年 6 月，哥伦比亚办事处与监察员办公室合作编写了“对法律援助办公室普通犯罪方案的分析报告。改革准则”，其中载有关于法律援助办公室的业务程序及其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的分析意见和一系列建议。调查结果被用来确定采取行动的范围。但法律援助办公室的预算形势及其对切实获得适当保护的权力可能产生的影响，令人十分不安。

147. 办事处正在与国家投诉审查和处理部合作编写一本关于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手册。

148. 正在为负责犯罪与监狱政策和公共政策的代表提供关于制定和落实执行监狱和教养所有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的咨询意见。

#### 检察长办公室

149. 检察长办公室和高级专员办事处已将技术援助项目谅解备忘录延至 2004 年年底。

150. 人权和民族事务预防行动司在驻哥伦比亚办事处的支持下进行了一项分析，查出了一些机构职能失调的问题。经与检察长办公室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和非

政府组织密切合作，编写了一份关于“检察长办公室在人权方面的预防性职能”的文件。

151. 惩戒侵犯人权行为司与哥伦比亚办事处合作对调查和惩戒侵犯人权行为方面的形势进行了分析。

## 九、建 议

152. 根据本详细分析，高级专员为 2003 年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重点和建议。这些建议不能说详尽无遗，现将其按以下六个标题列出：预防和保护；国内武装冲突；法治和不受惩罚；经济和社会政策；弘扬人权文化；以及办事处的技术合作和咨询意见。

153. 这些建议是针对政府中三大部门的国家机关及负责保护和增进人权事务的监督机构，并针对国内武装冲突各方和民间社会提出的。

154. 在不损害本报告中所审议的其他令人关注的问题，或办事处及其他国际机构提出的尚未加以落实的建设的后续行动的前提下，高级专员坚信，在 2003 年期间建议所涉各方面如能执行下列建议，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形势可能会大大改观。

### (a) 预防和保护

155. 高级专员鼓励该国政府在共和国副总统办公室、内政部和国防部的积极参与、合作和响应下，启动监察员办公室所建立的预警系统。

156. 高级专员促请该国政府确保由内政部人权司负责执行对人权维护者提供保护的方案能有效运作，有足够的资金，并用明确、统一的参数来评估危险。该国政府应永远选择采用对造成危险的因素起到预防性作用的机制。

157. 高级专员促请该国检察长在保护证人和受害者的方案中增加任何可能有助于尽快确定危险和针对危险采取迅速行动的修改内容。

158. 高级专员鼓励该国政府与监察员办公室和联合国系统合作了解哪些社区因国内武装冲突而面临危险；并经与这些社区协商，尽快制定和落实预防性和保



护性行动和方案。对流离失所者，应严格适用《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

159. 高级专员促请该国政府和国会为检察长办公室和监察员办公室提供必要手段，在其未设分支机构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尤其是在重建和巩固区以及土著人民、非裔哥伦比亚人和流离失所者占多数的地区。

160. 高级专员吁请检察署和高级公务员对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因任何形式的行为或玩忽职守而破坏从事人权维护者的工作采取惩戒性行动。

161. 高级专员促请检察长每季度对军事情报记录中所载有关从事人权维护者的资料进行核查，并公布核查结果。

162. 高级专员鼓励国防部从下一期保安部队培训班起，增加关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系统研究知识。为此，建议该部与监察员办公室为进行长期培训作出安排。

#### (b) 国内武装冲突

163. 高级专员促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民族解放军和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及其他游击队和准军事团体尊重所有平民的生命权。他促请它们在任何时候尤其不要攻击平民、滥杀、征募未成年人入伍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164. 高级专员促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民族解放军和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及所有其他非法武装团体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它们作为人质扣留的人，并不再从事不能接受的绑架行为。

165. 高级专员促请非法武装团体，尤其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民族解放军和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不要从事任何行为，使平民享有的人权可能受到影响，并使哥伦比亚履行其保护和保障人权义务的能力可能减弱。

166. 高级专员促请保安部队全面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其规定的义务，尤其是有关遵守限制、区分、相称和对平民实行普遍保护等原则的义务。

167. 高级专员吁请参与武装冲突的各方全面遵守关于禁止使用、存储、制造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原则对其规定的义务。

168. 高级专员建议该国政府、非法武装团体和民间社会的代表不遗余力、尽快开展对话和谈判，争取超越国内武装冲突，实现永久和平。进行此种对话和谈

判时，开始即应考虑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应在议程中包括关于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受审判的权利和获得赔偿的权利。

(c) 法治和不受惩罚

169. 高级专员吁请共和国政府和国会在通过政策和起草法律时，适当注意哥伦比亚作为国际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文书的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他促请政府和国会在通过和适用有关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政策和措施时，考虑关于合法性、必要性、相称性、及时性和不歧视的国际原则。他吁请政府和国会尤其不要让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中包括任何规定，允许军队士兵行使警察或其他不符合司法系统独立原则的职能。

170. 高级专员促请检察长向国会提交法案，确立检察院的官员和雇员的职业结构，以加强该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171. 高级专员促请检察长确保并加强检察院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处的独立性，并保证其工作人员受到保护，并为其提供开展调查的手段。

172. 高级专员促请检察长在检察院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处内部设一小组，专门调查保安部队人员与准军事团体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他还吁请国际合作机构支持他提出的这一倡议。

173. 高级专员吁请国防部对凡参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或犯下战争罪行的保安部队人员，立即责令停职，并就此通知司法和调查机关。

174. 高级专员吁请由共和国副总统担任主席的关于对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进行调查的特别委员会对此种违法行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件积极进行调查，并每季度向共和国总统、检察长、检察总长和监察员提交一份关于调查进度的报告。

175. 高级专员吁请共和国总统以国家元首和保安部队总司令的身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无论政府与准军事团体进行的对话情况如何，一律断绝政府官员与此种团体的成员之间的联系。高级专员还吁请总统在每年的两份报告中将此种措施的执行情况和结果通知该国检察总长和监察员。

(d) 经济和社会政策

176. 高级专员鼓励该国政府制定一贯的政策，缩小该国现有的不平等差距，并确保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降低文盲率和失业率，以及增加获得保健、教育和住房的机会。

(e) 弘扬人权文化

177. 高级专员建议该国政府通过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跨部门委员会，制定一份人权行动计划，确保将性别政策纳入工作正轨，并在 2003 年上半年提交一份关于执行该计划的时间表。

178. 高级专员建议教育部长从下一学年起，将人权教育纳入小学和中学的教学中。为此高级专员建议教育部与监察员办公室作出长期培训安排。

179. 高级专员吁请高级司法委员会、检察院和检察总署与监察员办公室作出安排，为其官员和雇员进行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长期培训。

(f) 办事处的咨询意见和技术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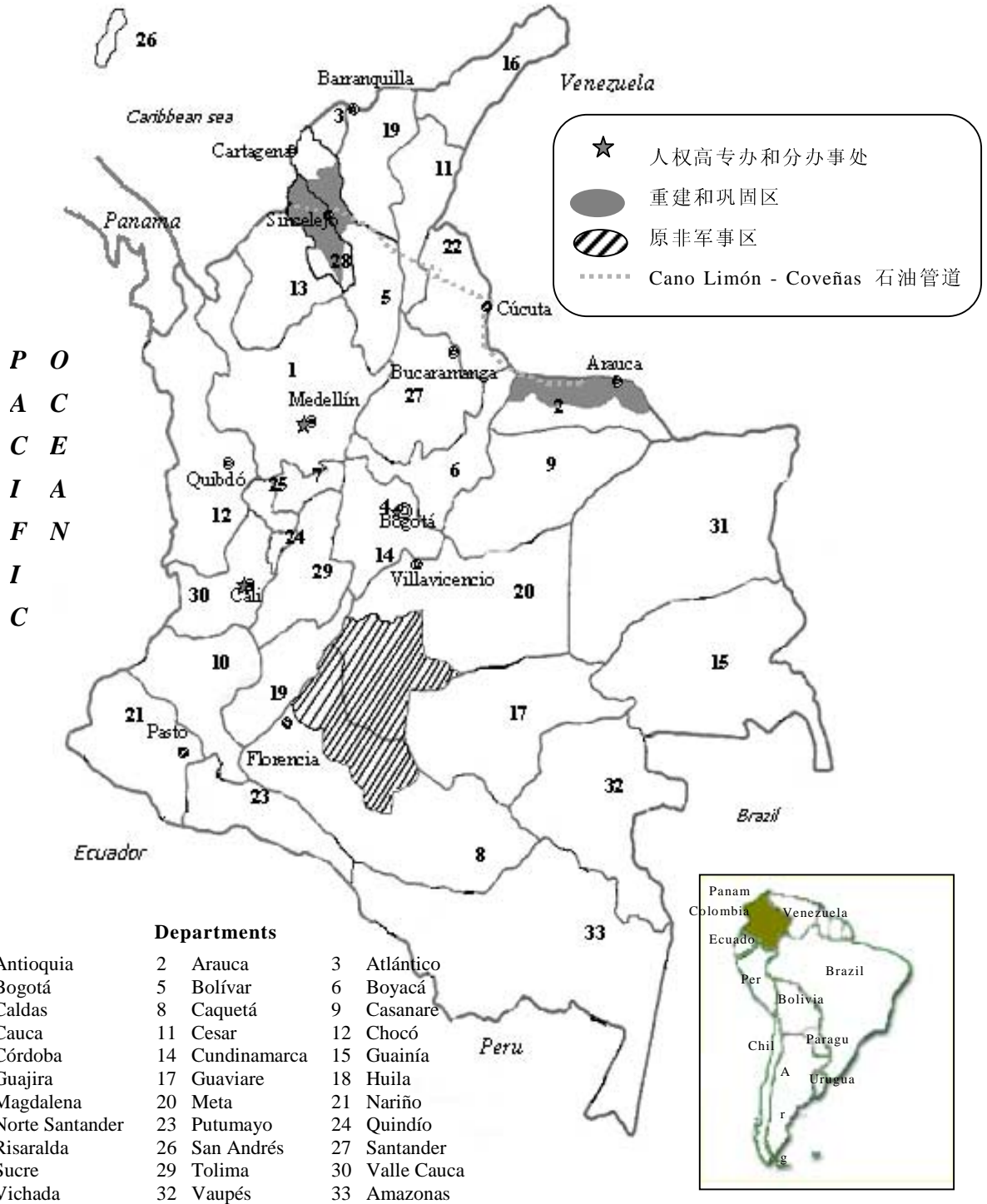
180. 高级专员促请该国政府对包括本报告中所提建议在内的国际建议采取行动，并吁请共和国副总统在办事处的协助和提供咨询意见的情况下，协调制定一份关于执行国际主管机构所提建议的时间表。

181. 高级专员请该国政府、国会、检察院、检察总署和监察员办公室与办事处加强对话，并全面利用办事处按任务规定提供的咨询意见和技术合作。

## 十、哥伦比亚地图

领土与行政分区。重建与巩固区。  
原非军事区

2002年12月



## 注

<sup>1</sup> 见《哥伦比亚：人权情况》，关于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总统方案，共和国副总统办事处，2002年10月11日第19页。

<sup>2</sup> 副总统负责政府的人权政策。他的办事处负责人权观察站，该站登记有关的资料和统计数字，以便跟进这一问题。

<sup>3</sup> 见下文第67至69段。

<sup>4</sup> 国防部，2002年军事行动。

<sup>5</sup> 见本报告附件，其中列有该情况的详细例子和统计数字。

<sup>6</sup> 正如本报告第七章中指出，哥伦比亚于2002年8月批准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但在战争罪方面作了保留。

<sup>7</sup> 见《2002-2006年国家发展计划》中关于人权的初步草案；政府散发以供提意见的正式文件。

<sup>8</sup> 总统咨询处关于男女平等的管理报告，2000年3月至2002年7月。

<sup>9</sup> 制裁家庭暴力的1996年第294号法令，经2000年575号法令修正；管理妇女有效和充分参与公共事务所有方面决策的2000年第581号法令(配额法)；有利于农村妇女的标准的2002年1月第731号法令。

<sup>10</sup> 在宪法法院中，九个法官中有一名妇女(11%)；国务院中，27名人员中有6名妇女(22%)；最高法院中，23名法官中有2名妇女(9%)；在高级审判员理事会中，13名成员中有2名妇女(14%)；共和国参议院中：102名参议员中有11名妇女(11%)；在众议院中：166名议员中有22名妇女(13%)。

<sup>11</sup> 根据检察长办事处，其国家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股没有对这类罪行进行调查。

<sup>12</sup> 见本报告附件，其中列举了主要的违反行为。

<sup>13</sup> 见该办事处2002年5月20日关于其访查Medio Atrato(Bojaejá, 2002年5月9-12日)的报告，这是在哥伦比亚政府特别要求下，作为其部分任务执行的。该报告也分析了准武装集团在没有遵守对平民区别和豁免权原则方面的责任，及国家在预防行动和保护人口方面的责任。

<sup>14</sup> 见：“人权(初步草案)，2002-2006年国家发展计划”第1页和CONPES和3172号文件：“加强有关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家政策的行动。”2002年7月15日，第12页。

<sup>15</sup> 该法令向安全部队授予司法权力，使之有可能摆脱独立的司法监督，而且在所谓的军事行动的威胁下或在公共秩序区里使民事当局置于军方的管辖之下。

<sup>16</sup> 见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女士2002年8月26日的函件，其中对建立新政府和告密者和招募农民表示关注。

<sup>17</sup> 该机构的官员可以被任意任命或解雇。尽管国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试图在一年之内(在 2002 年 10 月之前)实行一种职业制度，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向议会提出的关于改革司法部长办公室的提案也没有就改革这些问题作出任何规定。

<sup>18</sup> 其中一些人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进行了大量调查，有些人在履行公务时甚至受到了威胁。

<sup>19</sup> 应该回顾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哥伦比亚问题的结论性意见(1997 年 5 月 5 日，CCPR/C/79/Add.76, 第 23 段)。

<sup>20</sup>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理事会结社自由委员会报告说，在它所审查的所有谋杀、绑架、袭击或威胁工会活动家的案件中，只有一起案件查明了可能的罪犯。见报告 GB.285/9, 第 376 段。

<sup>21</sup> 其中包括 Rito Alejo de Río 将军、Fernando Millán 将军和海军上将 Rodrigo Quiñones。

<sup>22</sup> 哥伦比亚空军 1998 年 12 月空袭圣多明各(阿劳卡)杀害几十名平民的事件仍然属于军事管辖范围，而军事法庭已经开始审理被举报的塞哥维亚第十四旅成员和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团成员于 2002 年 8 月勾结案等案件。

<sup>23</sup> 根据比较资料来源估计系统，与 2001 年同期相比，2002 年上半年的强迫失踪案件上升了 100%。主要原因是普遍威胁(46%)，其次是打仗(22%)和屠杀(8%)。据社会团结网报告，在总共 1,098 个市镇中，有 887 个市镇出现了强迫失踪。

<sup>24</sup> 协调国家流离失所者照料系统的国家机构。

<sup>25</sup> 例如在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和国际移徙组织(移徙组织)联合技术股的支持下，对各地方委员会进行培训。

<sup>26</sup> 根据该网络的资料，2002 年，大约 11,000 个户人家取得了住房援助；3,000 个家庭在创造收入项目方面取得了协助，195 名年青人和 675 人取得了就业培训。

<sup>27</sup> 例如 2002 年 2 月在萨拉多(博利瓦尔)，2002 年 11 月在 Medio Atrato 地区。

<sup>28</sup> 据说，7 月，准军事团体征用了世界粮食规划署大约 200 批发货，而这是社会团结网准备在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 Wirw Arhuaca 社区分发的。

<sup>29</sup> 其他报告表明，3 月，军队威胁说，如果 Embera Katio 用船只运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官兵，它将派出准军事团体。

<sup>30</sup> 根据该网络的资料，略微高于 4%的流离失所者是土著人，19%是哥伦比亚黑人(2002 年 1 月至 9 月)。见难民署关于 1999 年至 2002 年返回难民的情况和关于哥伦比亚被迫国内流离失所照料政策结果的资料。

<sup>31</sup> 例如，有人威胁(系准军事团体所为)政治犯委员会基金会主席和大西洋省代表，因此后者由于安全原因而于 9 月被迫转移到波哥大。

<sup>32</sup> 例如，第 7 营营长 Andrés Leonardo Rodríguez 上校在 6 月 5 日《自由先锋报》上发表题为“特殊能源和高速公路计划”，批评中马格达莱纳的非政府组织，另外首都警察局长表示，8 月 7 日(总统 Alvaro Uribe 总统就职之日)组织对纳里尼奥住房的恐怖主义袭击的人“与最近建立的两个非政府组织有联系”。这种含糊不清的评论使所有非政府组织遭到其他非法武装团体的军事袭击。

<sup>33</sup> 那些控诉 1998 年 12 月对圣多明各(阿劳卡)任意空袭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受到哥伦比亚空军司令的起诉。

<sup>34</sup> 警察还于 11 月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了因德彭登西亚区妇女协会(Asociación de Mujeres de las Independencias)的 3 名妇女。10 月 9 日，巴兰卡维梅哈的 Cimitarra 山谷农民协会遭到突然搜查。

<sup>35</sup> See the report of the ILO Freedom of Association Committee (see note 20 above), paragraphs 375 and 382, and the report of the ILO Governing Board,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me for Colombia*, (GB.285/5, November 2002).

<sup>36</sup> 2001 年 12 月，美洲人权委员会要求哥伦比亚政府对该联盟的成员采取保护性措施。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也建议采取同样的保护措施。

<sup>37</sup> 另见本报告第八章第 102 段至 108 段。

<sup>38</sup> See report of the ILO Freedom of Association Committee (footnotes 20 and 35), paragraph 383.

<sup>39</sup> 有人指责哥伦比亚武装革命力量——人民军恐吓科隆市长(普图马约省)，于 7 月 17 日绑架了其 3 岁的女儿。根据内务部和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总统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方案》，该国 1,096 个市镇长中有 554 人遭到威胁。例如，554 个市镇受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的威胁，而圣巴勃罗(纳里尼奥)的市政当局遭到准军事团体的威胁。另外还应该提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于 4 月 11 日绑架了考卡山谷省议会的 12 名代表。总统人权方案报告说，除了受到主要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发出的许多威胁以外，43 名参议员、26 名地方政治领导人和 8 名市镇长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民族解放军、自卫团体和其他非官方武装组织谋杀。

<sup>40</sup> 根据总统人权方案，在 45 起案例中，市镇长仍然在不同的市镇或在本省的主要城镇担任职务。

<sup>41</sup> 见国家经济和社会规划委员会(第 3172 号): 加强国家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政策的行动纲领，2002 年 7 月 15 日，第 12 页。

## **Annex**

###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 **Main breaches and violations**

##### **I. INTRODUCTION**

1. The present document, annexed to the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olombia, supplements the description and the analysis in that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international law. It includes the main violations and breaches registered by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during the year 2002, giving details where available, and identifying the parties responsible and the groups that were particularly affected. Under some headings it also provides statistics on violations, responsibility, access to or exclusion from rights, and reflects the impact of some State programmes and measures on various topics.

##### **II. HUMAN RIGHTS**

######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 **(a) Right to life**

2. The right to life was affected by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nd death threats directed against members of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groups (including human rights defenders, trade union leaders, members of indigenous and Afro-Colombian communities and peasants). In some cases the executions were selective; in others they were part of social cleansing campaigns, perpetrated chiefly by paramilitary groups and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

3. During the year covered by this report, there was an increase in reported violations of the right to life, including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and massacres, attributed directly to public officials and more particularly to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 The tally of massacres included that of four minors and one adult in Medellín in February. The possibility that 24 paramilitaries were executed while not engaged in combat in Segovia on 9 August, is being investigated. The executions included that of an indigenous person in Puracé (Cauca) in October and of a youngster in Lloró (Chocó) in April, both attributed to the Army, and that of a member of the "Raizal" community in Providencia (San Andrés) in April, attributed to the police.

4. Some procedures undertaken as part of security policy, such as raids and arrests, led to civilian deaths attributed directly to the action of the security forces. Such acts occurred chiefly in the course of operation Orión, in Comuna 13 of Medellín in October, when three civilians died. Prior to that, nine civilians had been killed in the course of operation Mariscal in the same neighbourhood in May.



5. Massacres attributed to paramilitaries in which the State was blamed for failing to take action included those which occurred in Buenaventura (Valle) in May, in Santa Rita (Antioquia) in August, and in Atánquez (Cesar) in December. Massacres for which the State was considered responsible on account of the tolerance, support or complicity shown by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 included those perpetrated in Corinto in March and June, and in Limón on 31 August, against Wiwa indigenous communities.

**(b) Right to personal integrity**

6. There were reports of unnecessary or disproportionate use of force,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and torture. The Office registered an increase in complaints about the behaviour of officials involving either physical abuse of people in a position of inferiority or helplessness, or the unnecessary or disproportionate use of force. The cases of ill-treatment and disproportionate use of force generally occurred during prison riots, civilian strikes, protest marches, tenement evictions, roundups and searches. Examples of such cases occurred during the peasant march of 16 September in Bolívar and during operations in Medellín in May and October.

7. The Procurator-General's Office reported that, between January and November, 98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agains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 for torture and 8 for torture leading to death, practically twice as many cases as a year earlier. The reported deaths by torture included that of inmate Luis Preciado Osorio in Valledupar prison in March, and that of a woman in Argelia (Antioquia) in August, the latter being attributed jointly to paramilitaries and military personnel. As in earlier years,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cases of torture tend to be under-recorded.

**(c) Right to individual liberty and personal security**

8. This right was particularly affected by 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by illegal or arbitrary arrests. According to the Office of the Vice-President, and in light of the complaints examined by the Procurator-General's Office, there has been a slight increase in the blame attributed to State officials in cases of forced disappearances. Both people arrested on roads, pathways and other public highways in rural areas, during searches and military sweeps, and people last seen in their homes or at their places of work in urban areas were reported to have disappeared. Disappearances were blamed on public officials in cases such as that which occurred in Popayán (Cauca) on 6 and 7 January, when a minor disappeared after five people were arrested by DAS agents. Seven people disappeared in October following the security forces' operation Orión in Comuna 13 in Medellín.

9. Arbitrary arrests were reported in connection with cases in which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acting without a warrant, arrested individuals in violation of police rules on pre-trial detention or for reasons incompatible with respect for fundamental rights. In other cases, even though warrants had been issued, the arrests were not justified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Many of the arrests link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ree No. 2002, under which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arrested, were said to be arbitrary.<sup>a</sup>

**(d) Right to freedom of movement**

10. The most serious violations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residence were caused by unlawful impediments to free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by enforced displacements.<sup>b</sup> This year, impediments to free circulation arose not only from illegal checkpoints set up by armed groups to control the movement of pedestrians and traffic in areas under their control, but also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ree No. 2002, under which people living in rehabilitation and consolidation zones were subjected to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of legality, necessity and proportionality which must be observed even in states of emergency.

**(e) Right to privacy and inviolability of the home**

11. In the last months of 2002, the rights to privacy and inviolability of the home were affected especially by raids and searches under the aforementioned Decree No. 2002, which was used to justify frequent government raids on premises where crimes were not in progress and there was no imminent likelihood of punishable behaviou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2. Several reports<sup>c</sup> in 2002 highlighted the worsening poverty, the profound social inequity and inequality and the high degree of socio-economic exclusion in Colombia. The armed conflict, economic crisis and unlawful attacks by illegal armed groups on public property have damaged the situation of Colombian citizens as regards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These same factors, moreover, have affected the capacity of the Colombian State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the basic needs of the population, especially the most vulnerable sectors.

13. The problems of extreme poverty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re among the most serious. It is worth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ownership of land, considering that 1 per cent of landowners own more than 53 per cent of all cultivable land. At present 67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live below the poverty line, slightly less than the average since the 1980s, while 25 per cent fall into the extreme poverty category, a proportion which has risen substantially in recent years.<sup>d</sup> In rural areas, more than 40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live in extreme poverty. The situation with regard to children is even more serious, considering that 24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situated below the poverty line are under 10 years old and almost 14 per cent of children under 5 suffer from chronic malnutrition.<sup>e</sup>

14. Particularly affected is the displaced population, whose opportunities in terms of jobs, education and health are considerably reduced. Displaced persons do legally have access to health care, but administrative difficulties restrict the use of the resources available.<sup>f</sup>

15. Owing to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financial deficit, the Government was obliged in November to propose a tax reform to Congress. It may be wondered, however, whether the suggested changes really go to the heart of Colombia's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whether they answer the need for a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n increase in indirect taxation on 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country must be examined very carefully.

**(a) Right to work**

16. High levels of unemployment have persisted since the 1990s, rising from 9 per cent in 1995 to as much as 20 per cent in 1999. The problem was made worse by increases in underemployment and moonlighting in 2000 to 29 per cent and 60 per cent respectively. The economic crisis affected sources of employment in 2002, so that between January and September the jobless rate rose by 1.4 per cent and the underemployment rate by 5 points. In September 2002, 14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were unemployed and 35 per cent were underemployed.<sup>g</sup> At the same time, the coverage provided by the pension system remains seriously inadequate, since only 20 per cent of the workforce are covered.

**(b) Right to education**

17. Despite the efforts made in recent years, the education sector has been having problems in securing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reducing illiteracy. Low levels of net educational coverage have persisted, with rates of 26 per cent in advanced secondary, 52 per cent in basic secondary and 34 per cent in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basic primary rate has never exceeded 82 per cent. Nearly 2 million children and youngsters between the ages of 5 and 17 (16 per cent of the total) remain outside the school system.<sup>h</sup> This proportion is twice as high in rural areas (25 per cent) as in urban areas (12 per cent). Despite some improvements in net basic primary coverage in the last 30 years, this has stayed below the averag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Moreover, improved coverage has not necessarily brought improved quality.

**(c) Right to health**

18. Health-care coverage has improved in recent years, rising from 23 per cent to 52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between 1992 and 2000.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persist, howeve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rates of 57 per cent and 41 per cent respectively). Factors such as widespread evasion and avoidance, non-progressive fees for services, inadequate distribution of subsidies and an inefficient supply of services at the basic level of care, among others, have left a deficit in the clearing account of the contributory health-care system and support payments to the subsidized system have dried up. Despite an increase in health expenditure since 1993, this situation casts doubts on the viability of the current model.

**(d) Right to housing**

19. The public housing policy followed since 1991 has yielded positive results in ter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ubsidized housing. Nevertheless, there is still a shortfall of more than a million homes for 5 million people, 82 per cent of whom do not manage to earn four times the minimum wage (less than US\$ 500).

20. As a resul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1998, the amount of housing subsidized by the State was drastically reduced, falling from an annual average of 126,000 units in the period 1990-1998 to 40,000 in the year 2000. Nevertheless, the percentage of total housing finance provided rose from 15 per cent in 1995 to 49 per cent in 2000. Despite this proportionate increase, many

potential beneficiaries of the subsidy continue to experience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housing because they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obtaining the mortgage loans needed to pay off the cost of their housing.

### **Women's rights**

21. Despite the progress made from a legislative point of view, real in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persist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sup>i</sup> only 40 per cent of women have jobs, compared to 61 per cent of men. Men's earnings exceed women's on average by 16 per cent. Chronic unemployment affects 20 per cent more women than men.

22. Violence within the family has continued unabated. Women were the victims in 91 per cent of the 43,000 cases of marital violence and 61 per cent of the 14,000 cases of domestic ill-treatment (see report, footnote 20). Despite legislative progress, an effort should definitely be made to improve the protection, assistance and rehabilitation of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sup>j</sup>

23. Women's right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affected by the armed conflict. In conflict, women tend to be treated as objects and their state of unjust inferiority and subordination to men is further aggravated. Of particular concern is the vulnerability of displaced women and girls (who account for 47 per cent of all displaced persons), including those from rural areas, heads of household, indigenous women and Afro-Colombian women. Displaced women often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their dealings with the authorities owing to their lack of personal documents. Because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public policy on displaced women allowing a differentiated approach, it is difficult to attend to their specific needs for assistance and protection, especially against violence and sexual abuse. Also,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women's mental and emotional needs during and after displacement.

### **Children's rights**

24. Children's right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affected by the worsening armed conflict and the deepening socio-economic crisis in the country. Poverty and extreme poverty adversely affect children's rights to development, to education and to health, while exacerbating domestic violence. According to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out of almost 35,000 reported cases of familial violence,<sup>k</sup> 65 per cent were perpetrated against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8. Children are also the main victims of sexual abuse, since no less than 85 per cent of all reported cases concerned boys and girls. Approximately 35,000 children under 18 are sexually exploited in the country.<sup>l</sup>

25. According to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the infant mortality rate is 3.9 per cent, a figure which rises as high as 15 per cent in the Pacific region. In Colombia, 1,500,000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5 and 17 work;<sup>m</sup> some 20 to 25 per cent of these perform high-risk jobs, a percentage which rises as high as 70 per cent in the farming sector,<sup>n</sup> where the working day extends over 12 to 15 hours.

26. Displaced children represent a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group, bearing in mind that 40 per cent of all displaced persons are under 18 years of age. Even though the displaced population is for a period of one year allowed priority access to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is completely exempt from paying enrolment and boarding expenses, no specific budgetary provision is made to cater for their needs. The departments in many cases do not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to deal effectively with the situation, and in addition many displaced families do not manage to find their footing well enough to shoulder education costs once the year is up.

### III.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 (a) Homicides and threats against protected persons

27. The murder of people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ontinued to be a systematic practice on the part of the paramilitary groups, but was also perpetrated in many cases by FARC-EP and ELN. In some instances killings were attributed directly to the security forces. Many of the civilian victims of confrontations between armed groups are not recorded as homicides. Between January and October 2002, the Observa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Vice-President registered close to 3,000 homicides perpetrated by “organized units”.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those responsible are registered as unknown. As indicated by the Office of the Vice-President: “Although it cannot be stated categorically and there is no hard evidence, our analysis of the facts leads us to conclude that most of these occurrences may be attributed to self-defence units and secondly to guerrillas. At least 2,000 of these homicides are attributable to self-defence units and around 500 to guerrillas.”<sup>o</sup>

28. The policy of selective killings and social cleansing appeared to be a deliberate paramilitary strategy. In many areas of the country, such as Eastern Antioquia, the practice of selective killings by paramilitaries was quite routine. FARC-EP carried out systematic attacks, in several parts of the country, on local authorities such as mayors, councillors, municipal ombudsmen, judges and prosecutors.<sup>p</sup>

29. On the basis of figures provid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Human Rights, the Observa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Vice-President recorded 1,110 victims of massacres between January and June 2002. Of these killings, more than 50 per cent were attributed to paramilitaries, and the rest mainly to FARC-EP, the Army, ELN and unidentified armed groups. Among the massacres, many of which were cruel and brutal, paramilitary groups were blamed for killing seven people in Barragán (Valle del Cauca) in August, and eight in November in the municipality of San Carlos (Antioquia). FARC-EP were blamed for massacring 15 people on the estate of El Tapón, near San Juan Nepomuceno (Bolívar), in late August. Details of the attack in Bojayá (Chocó) are given in paragraphs 33 to 35 below.

30. The number of murders and massacres in towns rose as a result of increased military activity in urban areas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militia groups linked to FARC-EP, ELN and paramilitary group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Medellín, for instance, self-defence groups were blamed for massacres of civilians, such as the on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Carambolas on 5 October, and that of five displaced persons, including two minors, in the municipality of

Itaguí on 24 October. Guerrilla groups were blamed for the massacre of four women in the district of Floresta on 16 July, and the killing of two young men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Olaya Herrera in June.

31. The Office also came across reports of murders allegedly carried out by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 For example, during military operations conducted between 2 and 8 July 2002 by the Fourth Army Brigade in Eastern Antioquia, the disappearance was reported of at least six peasants who were subsequently executed and buried in common graves. Other complaints concerned the execution of a 12-year-old boy, on 30 March, as he was running for cover during an operation by members of the same army brigade who entered the neighbourhood of Olaya Herrera in Medellín, accompanied by hooded individuals.

32. Death threats were the tactic most frequently used by illegal armed groups to bring about the displacement of persons considered “undesirable”, either because they were suspected of collaborating with the “enemy”, or to seize their belongings, or to terrorize them and bring them under control, or else to decimate social organizations, or to exact a financial contribution. By means of threats, these groups prevented free move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Office received complaints of threats agains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that were attributed to the Army, for instance during an operation in Santa Ana (Antioquia) in September, when soldiers accused the local inhabitants of belonging to guerrilla forces and threatened several of them.

**(b) Attacks on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indiscriminate attacks**

33. The humanitarian principles of distinction, limitation, proportionality and immunity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continued to be violated by all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onflict in Colombia.

34. Operations by guerrilla groups, especially FARC-EP, featured the indiscriminate use of “home-made” weapons, such as gas cylinders and other explosive artefacts, which caused the deaths of many civilians. The worst of these attacks occurred on 2 May 2002 in Bojayá (Chocó), when a gas-cylinder bomb launched by FARC-EP during a clash with paramilitaries hit a church where a group of civilians trying to escape from the fighting had taken refuge. The bomb killed 119 civilians, including 48 children, and injured over 100. This despicable act illustrates how low the armed conflict has sunk and the conduct of illegal armed groups, in this case FARC-EP, who launched the bomb although aware of the presence of civilians and the indiscriminate nature of their combat methods, massacring one of the highest numbers of victims in recent years.<sup>4</sup>

35. Cases were reported of harassment and attacks, chiefly blamed on guerrilla groups, on people living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department of Cauca and in the Pacific coastal area of the departments of Cauca and Nariño. On 20 September, some 200 ELN fighters attacked the municipality of Samaniego (Nariño), abducting 7 persons, of whom 2 were later found dead. In other cases, FARC-EP used civilians as human shields when the Army arrived, opening fire indiscriminately in order to cause confusion and facilitate their own escape. This happened in April during an attack on Quilcace (Cauca). Similarly, the paramilitaries who rounded up civilians during their battle with FARC-EP in Bojayá (Chocó), as mentioned earlier, did not

hesitate to expose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to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fighting. The Army was reported as using and occupying civilian housing in Chalán from October onwards.

36. Paramilitary groups also continued to attack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conduct indiscriminate attacks. Between 7 and 10 August, the Autodefensas Campesinas de Córdoba y Urabá (Peasant Self-Defence Groups of Córdoba and Urabá, ACCU) attacked the village of Santa Rita, traditionally under FARC-EP control, leaving 11 civilians dead and 2 missing.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security forces have been almost completely absent from the area for the last two years.

37. The Office received reports of attacks on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indiscriminate attacks for which Army personnel were held directly responsible. They included an attack in September in the village of Santa Ana, in the municipality of Granada (Eastern Antioquia), and attacks by soldiers of the Fourth Army Brigade and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in neighbourhoods of Medellín. Among the latter, special mention may be made of operation Mariscal, launched on 21 May, in which the security forces used heavy weapons, armoured vehicles and air support, killing 9 civilians and injuring another 37, including people waving white flags. On 16 October, operation Orión left 3 civilians dead, 40 more injured, and 7 people missing. According to preliminary incomplete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Office, at least 39 civilians are said to have died in operations conducted by the security forces in Medellín during the year (including 14 minors) and 120 were wounded. Several cases were also reported of indiscriminate air attacks by the Armed Forces, chiefly in the department of Cauca, which affected civilian persons and property. Such attacks occurred in the municipality of Belalcázar in May and in the district of Pitayó on 21 August.

**(c) Terrorist acts<sup>r</sup>**

38. The worsening armed conflict included many acts of terrorism in the country's main cities, mostly perpetrated by FARC-EP, with many civilian victims. Terrorist acts using explosive devices became more frequent after the breakdown of the peace negotiations. They constituted a strategy that served to terrorize the population, demonstrate the operational capacity of the guerrilla forces and send a political message of defiance to the Government. A bomb was set off on 14 April in Barranquilla (Atlántico), while the motorcade of the the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lvaro Uribe, was driving past. The latter escaped unhurt, but the attack, which the authorities blamed on FARC-EP, left four civilians dead and many more injured. On 19 April, a wave of dynamite attacks were mounted by FARC-EP in exclusive neighbourhoods of Cartagena (Bolívar), killing three people. On 7 August 2002, as President Uribe took office, FARC-EP launched multiple, indiscriminate mortar attacks in Bogotá, killing 21 people and leaving 100 more injured. On 13 December, senator German Vargas Lleras received a parcel bomb which injured him seriously. The same day, another bomb was placed in a restaurant in the centre of Bogotá, resulting in injuries to around 30 people.

39. Both the paramilitary groups and the guerrillas were responsible for acts and threats of violence designed to spread terror among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of the security forces threatening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either as a form of reprisal or as a means of forcing the community to cooperate. Such cases occurred in El Limón on 31 August, and in Santa Ana in September.

**(d) Torture and other affronts to personal dignity**

40. The paramilitary groups, FARC-EP and ELN have all been accused of torturing victims before killing them. In a number of instances, besides being tortured, the victims of massacres and assassinations, especially by paramilitary forces, had been sexually abused and their bodies hideously mutilated. One example was the massacre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peasants in La Guajira on 31 August. FARC-EP were accused of beheading 9 soldiers in San Vicente del Caguán (Caquetá) in May, and ELN, of torturing and killing 2 people in Samaniego (Nariño) in September.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ill-treatment by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sup>5</sup> There were also many complaints of civilians being held by illegal groups and suffering ill-treatment and brutality at the hands of their captors. On 5 March, at an illegal AUC checkpoint in Cauca, a boy was severely tortured, to the point of being laid in a coffin for several hours alongside a corpse.

**(e) Hostage-taking**

41. The practice of hostage-taking continued to affect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Colombian citizens and several foreigners. In many cases, it served to collect funds for illegal armed groups in the form of kidnapping for ransom. For the first time FARC-EP overtook ELN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hostages seized, becoming the leaders in this category of offence. The paramilitary groups have resorted increasingly to this practice in order to raise money or for “political” reasons. According to the País Libre Foundation, 2,730 kidnappings took place between January and November 2002, 20 per cent of them in the department of Antioquia alone. Several were perpetrated by illegal armed groups in league with criminal gangs. Large-scale kidnappings have become commonplace among guerrilla groups, owing to their political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and as a means of spreading terror among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42. Several people have been taken hostage because of their political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This was the case with Senator Jorge Eduardo Gechem Turbay, on 20 February, and with presidential candidate Ingrid Betancourt, on 23 February, both victims of FARC-EP. Other FARC-EP hostages included 12 deputies of the Valle del Cauca Assembly, on 11 April, and the Governor of Antioquia, Guillermo Gaviria, who was abducted together with his peace adviser, Gilberto Echeverri, on 21 April. On 11 November, FARC-EP abducted Monsignor Jorge Enrique Jiménez, the bishop of Zipaquirá and president of the Latin-American Episcopal Council (CELAM), and the parish priest of Pacho (Cundinamarca), Desiderio Orjuela; they were rescued by the Army in a swift operation on 15 November.

**(f) Child victims of the armed conflict**

43. Children continued to be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victims of the armed conflict, in particular on account of displacement, recruitment, anti-personnel mines and indiscriminate attacks by outlawed groups. For instance, 45 children died during the events in Bojayá (Chocó). Many have been killed by guerrilla and paramilitary groups. AUC were blamed for kidnapping and torturing three minors in Medellín, on 16 August,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armed organizations in the neighbourhoods where they lived. Two of the children were killed and the third injured. The Office also received reports concerning several cases of minors who had fallen victim to indiscriminate attacks during operations by the security forces such as



operation Mariscal, which took place in Medellín in May. According to the País Libre Foundation, 357 minors were taken hostage in the first 10 months of 2002, i.e. 13 per cent of all victims of this offence.

44. The various guerrilla and paramilitary groups continued to recruit minors under 18 years of age into their ranks. Occasionally the mere threat of recruitment led to the displacement of whole families.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was informed that on 3 August, ELN troops took 22 youngsters from the district of Altamira, La Vega (Cauca), with them to join their fighting units. In August, an announcement by FARC-EP that all youths over 12 years old would have to join up led to the displacement of 60 families in the municipality of Cunday (Tolima). Reports were also received of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being imposed on minors by paramilitary groups. Increasing forced recruitment by illegal armed groups of minors who had taken refuge in the border areas of Panama, Ecuador and Venezuela was reported.<sup>t</sup>

45. Although there are no consolidated statistics on the exact numbers of children taking direct part in hostilities, nearly 7,000 minors are estimated to be fighting with FARC-EP, ELN and the paramilitaries.<sup>u</sup> Another 7,000 are believed to belong to urban militias linked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armed conflict.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flict to urban areas has led to increased recruitment of minors by illegal militias, as in Medellín.

46.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has received information about minors being used as informers by the Army in Meta and Putumayo, sometimes with the offer of reward.<sup>v</sup> The same was reported when the police arrested three members of the Asociación de mujeres de las Independencias (Las Independencias Women’s Association, AMI) in Medellín in November: a child wearing a hood was said to have been used as an informer.

**(g) Women victims of the armed conflict**

47. Women have been subjected to various kinds of violence, especially sexual violence,<sup>w</sup> by illegal armed groups to spread terror or demonstrate their dominance and control over a territory. Women are also subject to cruel punishment if they do not follow the codes of conduct imposed by paramilitary groups in various areas of the country.<sup>x</sup>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has received accounts of girls being subjected to sexual abuse by members of guerrilla and paramilitary groups. The situation of women’s organizations has worsened this year owing to threats against women’s lives and personal integrity, selective killings, and displacements blamed on illegal armed groups. Some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threatened because they defended the rights of women, particularly those of peasant, Afro-Colombian, indigenous and displaced women. This was true of the Organización Femenina Popular (OFP), the Asociación Nacional de Mujeres Campesinas, Indígenas y Negras de Colombi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asant, Indigenous and Black Women of Colombia, ANMUCIC) and the Liga de Mujeres Desplazadas de Bolívar (League of Displaced Women of Bolívar).<sup>y</sup>

48. Fighting women enrolled in illegal armed groups suffer disregard for thei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by their fighting companions. According to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out of a group of 65 under-age girls investigated in 2001, all “wore intrauterine devices, some inserted against their will, with no information of any kind, merely because it was an order on which their continued enrolment in the group depended”.

**(h) Attacks on medical personnel and units**

49. There was a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attacks, kidnappings and threats against medical personnel by guerrilla and paramilitary forces. Incidents included attacks on hospital centres and medical and paramedical personnel, threats against health service personnel, attacks on ambulances, refusals to allow ambulances onto the streets, and interference with preventive care such as vaccination campaigns.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 of the Office of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more than 25 cases of this kind occurred between January and August 2002.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Health, more than 80 per cent of the attacks on medical units consisted in attacks on the lives and personal integrity of staff, murders, threats and temporary detention at checkpoints. On 20 March, for instance, on a roadway in the municipality of San Carlos, four persons died, including one pregnant woman, when a grenade apparently thrown by FARC-EP at the ambulance transporting the woman exploded. On 11 December, the municipal ombudsman of San Carlos de Guaroa (Meta), who was being transported in an ambulance, was taken hostage, allegedly by paramilitaries.

**(i) Attacks on civilian property**

50. There was an increase in attacks on civilian property, particularly on public infrastructure, by guerrilla groups, with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electricity and water supplies, for the fragile road network and for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se attacks also caused many civilian deaths. According to the Judicial Police Office (DIJIN), the number of attacks increased by 49 per cent in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the year (the number of bridges blown up rose from 2 to 11 a month, and the number of pylons destroyed from 21 in 2001 to 55 in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2002). Attacks by FARC-EP and ELN guerrillas on the Caño Limón-Coveñas pipeline, though fewer than in 2001, caused heavy damag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51. Indiscriminate attacks by guerrilla and paramilitary groups, and the indiscriminate use of force in some military operations, caused considerable damage to civilian property. In other cases, both attacks by illegal armed groups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included the plunder and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as in the district of La Unión, in the Community of Paz de San José de Apartadó (Antioquia) in March, and in El Limón (La Guajira) in August.

**(j) Use of anti-personnel mines**

52. The use of mines increased considerably. According to the Landmine Monitor, 256 municipalities were affected by the presence of mines, in 28 of the 31 departments in the country. FARC-EP, ELN and the paramilitaries, in that order, were those mainly responsible, while Antioquia, Santander and Cauca were the departments worst affected. There has been a sharp rise in recent years in the number of victims (203 in 2001, and 129 up to July 2002) and incidents (201 in 2001 and 129 up to July 2002). Of the estimated 130,000 mines strewn across Colombia by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2002, the great majority had been laid by non-governmental armed groups, while the Colombian Army reportedly maintained approximately 18,000 mines to defend fixed positions.<sup>z</sup>

53. The new trends are deeply alarming since all the outlawed armed groups have acquired an impressive capacity for the immediate, in situ manufacture of home-made mines, leaving far less scope for controlling them. Of particular concern was the widespread use by guerrilla groups of anti-personnel mines in hotly contested areas, especially in the municipality of Cocorná, in Eastern Antioquia, and in municipalities of Norte de Santander and the region of San Vicente del Caguán. The Office in Colombia was informed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he Army had mined the Munchique hills, an area crucial to communications in south-western Colombia. The José Hilario López Battalion in Popayán claimed this was an exceptional measure to protect the power station, since the area had suffered heavy attacks by guerrilla forces, and the mined area was clearly marked to prevent civilian casualties.

### Notes

- <sup>a</sup> See analysis of the state of internal commotion in paragraphs 63 to 66 of the repor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impunity, in paragraphs 78 to 87.
- <sup>b</sup> Fo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movement, see paragraphs 88 to 94 of the report.
- <sup>c</sup> See for example the report of the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General, “Colombia: between exclusion and development”, dated July 2002.
- <sup>d</sup> The proportion remained above 19 per cent during the 1990s.
- <sup>e</sup>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General, “Colombia: between exclusion and development”, July 2002.
- <sup>f</sup> In add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s Circular No. 042 of November 2002 may render access to health care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displaced persons.
- <sup>g</sup> National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DANE) - Continuous Household Survey, October 2002.
- <sup>h</sup> See discussion in National Planning Department, “Bases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2002-2006”.
- <sup>i</sup> See report, footnote 8.
- <sup>j</sup> According to the Inter-Institutional Committee against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 in 1999, almost 50,000 Colombian women had been sold abroad. Executive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in Colombia, Inter-Institutional Committee (1998-2002).
- <sup>k</sup> A figure given by the Forensic Medicine Unit for the period January-October 2002.
- <sup>l</sup> UNICEF, “La Niñez colombiana en cifras”, November 2002, p. 42.

<sup>m</sup> A figure published in *El Tiempo* of 29 November 2002, giv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DANE “Survey of the population aged from 5 to 17 years in Colombia”.

<sup>n</sup> See footnote 1, p. 44.

<sup>o</sup> See Communication of the Presidential Programme for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Office of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Statistics 2002, 8 November 2002, p. 3.

<sup>p</sup> See report, paras. 30 and 31.

<sup>q</sup> See the Office’s report dated 20 May 2002 on its mission of observation in the Medio Atrato (Bojayá, 9-12 May 2002), carried out as part of its mandate and at the express request of the Colombian Government.

<sup>r</sup>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report, terrorist acts are understood to be thos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4.2 (c) of Protocol II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and the acts and threats of violence aimed at terrorizing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prohibited under article 13.2 of that Protocol.

<sup>s</sup> See chapter V of the report.

<sup>t</sup> According to statements by the UNHCR spokesman, Kris Janonski,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21 May 2002, at the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Colombia, UNHCR concern at the recruitment of refugee children”.

<sup>u</sup> See note 1 above, p. 44.

<sup>v</sup> “Report 1379”, Coalition to stop the use of child soldiers, November 2002.

<sup>w</sup> Like those repor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ucre in Medellín attributed to paramilitaries, and in the department of Huila, attributed to FARC-EP. The rape of a girl blamed on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rmy in the department of Antioquia is a matter of particular concern.

<sup>x</sup> Such cases are believed to have occurred in Barrancabermeja (Santander), Santander de Quilichao (Cauco), Turbo (Antioquia) and Puerto Asis (Putumayo).

<sup>y</sup> See the progress report on follow-up to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s. Radikha Coomaraswamy, by the “Women and Armed Conflict” panel.

<sup>z</sup> Landmine Monitor Report 2002 on Colombia, September 2002, p. 59, quoting the 2001 Human Rights Practices Reports, published in March 2002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